



2010 年 8 月 31 日第 15 期

总第五十六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唐少杰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写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出版之后](#)

[丁凯文 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史林一叶

[高原 内蒙全面军管与余洪信事件](#)

访谈

[《记忆》编辑部 胡杰访谈](#)

蓦然回首

[冯敬兰 1966 年 8 月 28 日](#)

[戴为伟 歌咏比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陈仁德 一个人有动脉](#)

简讯

[舟 人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正式出版](#)

书评与序跋

[启 之 默默耕耘的成果——《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何 蜀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后记](#)

[童 话 值得一读的《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

文摘

[杨逢彬 祖母和她的左、右派儿子们](#)

小资料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 1、[林雪来信](#)
 - 2、[小庄来信](#)
 - 3、[平衡来信·编辑部答复](#)
 - 4、[陈寿仁来信·编辑部答复](#)
-

【国史笔谈】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写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出版之后](#)

[唐少杰](#)

200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波尔纳普出版社（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先生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麦克法夸尔先生致力于文革研究四十年之久，他的文革研究专著乃至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早已为中国学界所耳熟能详。沈迈克先生（我们都习惯称他为“迈克”）是世界范围的文革研究的领军新秀，他关于文革的著作、文章及演讲和讨论等等无疑表明了他的文革研究的深厚功底。例如，他来清华大学做学术报告时调侃自己是文革时期的“工农兵留学生”（他于1975—1976年留学复旦大学），这个相对应于“工农兵学员”的称呼，可谓迈克先生发明的“专利”。非常有意思的是，麦克法夸尔先生的中文名字为“马若德”不太为国人所牢记，而 Michael Schoenhals 先生的中文名字“沈迈克”却为中国文革学术界所熟知。无论怎样，这两位先生都是享誉整个世界的文革研究学者。

欣悉《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问世后，我自然非常想得到此书，先睹为快。十分高兴的是，2007年7月3日，我收到了迈克先生题词馈赠我的英文版此书。差不多就在此时，上海的出版家汪宇先生委托我对已经完成的此书的全部译稿进行校对。我既非常高兴又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我高兴的是我比较熟悉两位作者——我既上过麦克法夸尔先生那蜚声哈佛

大学内外的文革史课程，又同迈克先生多次聚会、多次恳谈。我惶恐的是基于我个人的学识和功力，对于这部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历史甚至就是“毛泽东文革史”的专著的译校，我很难达到“信、达、雅”三者统一的标准。尽管如此，出于我个人对于文革问题的长期关注，我毕竟愿意为此书中译本的问世付出绵薄之力。译者“关心”大致上是一个翻译集体，他们各自的翻译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基本上使译文达到了通顺流畅的水平。我把译者们的行文风格加以统一之后，还尽力对作者使用的有关史料做了考证（虽然做得远远不够）。我在较为繁忙的教学活动之外，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数易译稿，终于在北京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给汪宇先生交上了定稿。

我要再次提及的是，在我校对《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译稿时，迈克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这不仅是在他对全部译稿的通读或校读上，而且在该书原版英文本实用的第一手中文原始资料或文献的中文“回译”上。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不可能是对原有语言（特别是其语境和其蕴涵）的完全“再现”和完全“复制”。在我看来，对于迈克先生的一些修订，亦如我在港版简体字本的“译校后记”和在台版繁体字本的“译校者序”所说的是“中文改写”或“中文再创造”，因为迈克先生更加细心地照顾到汉语读者的语境和汉语世界的蕴涵。

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译本问世后，我还收到了阎长贵、吴迪(启之)、何蜀、范世涛、司马清扬、余汝信等先生给我发来的相关书评以及鼓励和校勘，特别是吴迪（启之）先生发来的批评文章指正了我们的译、校中的数十个“误译、误植”等等，这些都使我所学非浅，受益至深。

又如，广东《开放时代》副主编吴铭先生近日给我来信指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简体版第14页的那个校注，不准确。这个注是我加的，我把原作者所说的毛泽东1964年12月28日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带着“他的党员证和一本宪法”，把“党员证”校注为：“实际上为一本中共党章”。吴铭先生指出：“毛泽东当时拿着两本书，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没有争议；另一本既不是党员证，也不是党章，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吴铭先生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373—13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我所依

据的是（尽管在译文校注中没有标明）钱理先生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第403页上的表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显而易见，是我错了，我延续了比较流行的把毛泽东那一天所带的文件之一说成“党章”的说法，尽管毛泽东本人当时看重的就是“八大会议文件”中所收入的“党章”。

值此之际，我不仅要向上述诸位先生致以谢忱，而且我要再次重申我在上述提及的“译校后记”和“译校者序”中所强调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有关译文的水平或质量，由我负责”。作为校对者和译文定稿者，我不仅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深切的歉意，而且还要把诸位文革研究同仁暨学术方家提出的批评、指正落实到我未来对《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的再版修订之中。还有一点，我要回应吴迪（启之）先生商榷的就是：他指出我们在简体字本第4页（繁体字本第22页）上，把提及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那句话时，两位作者所用的“notorious”（英文原意是“臭名昭著的”、“声名狼藉的”，也有“众所周知的”、“著名的”意思）译成了“闻名昭著”，实为一例“误植”。我要解释的是：译者原来的译法也用的是“臭名昭著”，但是经过我细想，两位作者不会对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大加褒贬，更不会大加丑化，所以我用了—一个中性的“闻名昭著”来表述，尽管常用的汉语词汇中还没有这一表述，但是，我认为，正如翻译本身就是基于一种语言而对另一种语言的“再创造”，用我的这个表述可能更加符合两位作者的原意。

毋庸置疑，《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的出版家以及译校者最大的希望就是使该书首先能够在文革的故乡出版、发行。为此，我们也曾经联系过有关出版社，并请他们把我们的译稿转送给有关机构或部门“审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这一希望在现今只能化成遗憾后的惆怅加上失望后的无奈。

然而，令人可喜的是，由“关心”翻译、我本人校对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译稿，在去年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了两个版本：一是2009年4月由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文简体字本，该版本全书约计650页；另一是2009年6月4日由台湾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中文繁体字本，该版本全书约计近700页。目前，《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流入大陆内地的更多的是中文简体字本。简体字本对大陆读者来说，版式清新，左起横排，字型适中，容易

通读。

但是，这个简体字本也有几点不足：一是把我个人所写的“译校者序”改成了“译校后记”，把这一序言置于全书的末尾。二是把丁学良先生写的题为“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一文放在全书之首。这篇读起来有些令人荡气回肠的引言性的文章，在我看来，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对迈克先生在完成《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所做的工作估计不足、评价不够，这可能与丁学良先生不太了解迈克先生有关，更可能与他不了解迈克先生在写作此书时的努力或作用有关。正如麦克法夸尔先生在“序言”中所写下的：“迈克撰写了大多数章节的第一稿，以后又数易其稿”，迈克先生为该书的完成做出了从框架设计、章节构思到具体写作再到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方面的独特贡献。三是简体字本在编辑时对我们的译校定稿以及作者写的“中文版序”有所改动。例如，原著的“导论”就是导论，没有附加的标题，而简体字本在目录表上却成为“导论 毛的思想演变”这个题目，“毛的思想演变”实际上是“导论”下面的一个小节标题，简体字本在正文中就改过来了。又如，迈克先生用中文执笔写出的“中文版序”最后一段原来是“最后，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关心和唐少杰二位先生的翻译。《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翻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简体字本把最后一句话给改成了“他们的翻译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迈克先生是用了文革中常见的一句流行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来表示他对我们译本的认可，这也说明了迈克先生对文革话语的谙熟。简体字本的这一改动反而没有显示出迈克先生的文笔和学识的特色。

中文繁体字本版式比较紧凑，右起竖排，字型略小，并在首次发行时套在封面上的提示词上醒目地标注有一行字：“要了解当代中国，必先了解文化大革命”。与简体字本不同的是，繁体字本在卷首的“中文版序”和“译校者序”之后，加上了由台湾《新新闻周报》总主笔杨照先生撰写的“导读 理解现实中国的锁钥”。这篇导读充分反映出了台湾文人学者对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原版书中第 152 页至第 153 页上所引用的文革初期那个著名的并遭到毛泽东斥责的“百丑图”（署名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画军总部合印”），在简体字本第 154 页至第 155 页上出现过，而在繁体字本却出现过三次，即：不仅在第 166 页至第 167 页上用深色出现过，而且在全书扉页上和封底前的

页面上两次用浅色出现过。

在我看来，简体字本和繁体字本共同具有的缺点在于：一是把英文原版书中的五十余幅分为两个部分插入的照片，全部移入到全书之首，这显得不够协调；二是依循英文原版书的做法，两个版本都把两千多条注释放入全书的尾部，占有上百页之多的篇幅。当然，这里也有我们译、校者的责任，我们当时在译、校时没有作到范世涛先生在其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方便汉语读者，应该把书后注释改为相关的同一页的脚注。三是除了按照英文原版书把包括数十个知名人物在内的简介性的“人名表”（繁体字本用的名称是“人物简介”）、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列在书后之外，两个版本都把我们已经全部译出的、根据英文原文版所列出的可根据页码检索或可前后查对的“索引”省略掉了。其实，这个罗列了全书出现过的数千条人物、专有名称或术语或关键词、组织、报刊、文献或文件、运动或事件或活动等等的“索引”，对于汉语读者的进一步研读十分有用，十分重要。我估计，两个中文版本的这一共同做法可能是出于编辑这一可根据页码检索或可前后查对的“索引”的费时费力。实际上，编辑过程的费时费力可以带来读者研读之际的省时省力。我认为，这一“索引”的阙如影响了这两个中文版本的出版质量。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意义和价值，不用我在这里赘述（我在该书两个中译本的“译校者序”和“译校后记”中已有同样的简述），因为，在该书出版之后到今天的近四年的时间里，不仅已有该书的英文版（包括精装本和简装本）的再版，还有该书的法文版、西班牙文版、韩文版以及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等多种文字的版本陆续出版、发行，更有该书的日语版等其它文字的版本行将问世；该书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有国外研究中国问题（包括文革历史）的诸多学者和专家的好评如潮为证，而且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或研究者所关注、所肯定。

两位作者在该书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谨以此书献给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有关文革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也谨以此书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更自由地研究和著述这些年代发生的事件。”不断品味这段沉甸甸的题词，我痛切地体验到，它既是对于文革故乡文革研究现状的某种凝缩式的写照，也是对于文革故乡文革研究发展的一种深情的寄望。

毫无疑问，《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出版以及中译本的问世，无论是在整个世界范围还是在文革故乡，都有助于推进人们追溯文革、研究文革和反思文革。对于这些追溯、研究和反思，我要老调重弹的是：“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史笔谈】

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丁凯文

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就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独特意义的专著。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时也吸取了不少这些年来史学界有关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解析了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西方史学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该书对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无疑会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书中论述的“林彪事件”是笔者关注的重点，研读之余，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1）关于毛泽东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一事，作者认为毛泽东真实的意图是传位于江青和她的亲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理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星克尔出版社 2009 年 4 月版 327 - 328 页，以下简称该书并只标明页数）

1970 年 8 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彪在庐山上主动发起的针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斗争，使毛泽东赫然发现，林彪在党内竟然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一伙又是如此不得人

心，林彪的一篇讲话就几乎置张春桥于死地，如非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极左派们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泽东倾其后半生发动的文革运动就有可能在其身后被否定被清算，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观之，林彪绝非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张春桥们才是毛真正意义上的衣钵传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尤其是让这伙人逐步地掌控军权，张春桥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而这在林彪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江青、张春桥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毛身后继续推行毛泽东那套乌托邦的理论和实践。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看得是很准确的。

〔2〕关于林彪是否有“篡党夺权”的意图，作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作者指出：“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作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该书 329 页）

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早有大陆的学者予以论述（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见《重审林彪罪案》上册，明镜出版社 2004 年版），在“913 事件”前，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至多是对毛泽东的劝进，希望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时出任国家主席，林彪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赞同。文革极左派的重量级人物康生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

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387 页）而最先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者却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在 1971 年 8 月南巡途中，指责林彪“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急于夺权。”可毛泽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该书作者看到这一关键的问题，指出：“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叶群的野心，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希望得到这一职位。”（该书 329 页）事实上，“913 事件”后中共拿出来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关押期间的交代，即“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但是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日后所否定，指出那不过就是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由此可见，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毛泽东的构陷，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法理依据完全是向壁虚构。

（3）关于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毛泽东的“政变阴谋”，该书作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作者指出：“正是由于 9 月 12 日至 13 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9 月 12 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339 页）

该书的作者在此并不盲目地轻信大陆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说辞，而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质疑官方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该书 339 页）大陆官方在“913 事件”后指责林彪和叶群密谋策划了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阴谋，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在前台发动这场政变，并将林立果周围的亲信的“供词”作为林彪涉案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来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划的所谓“杀毛”大计，皆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应属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谓林彪要谋害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内容皆属于林立果周围个别亲信人士在“913 事件”后的口供，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殊为可疑，在那个年代里官方可以任意制造出他们需要的“口供”，这早已被太多的史实所证明。尽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证据却几近于无。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划“政变”的设想完全属实，亦无证据将林立果的言行与林彪直接划上等号。由此而观之，那个所谓的“杀毛”的设想仅仅是林

立果的一厢情愿，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施。根据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向专案组的交代，林立果把“杀毛”这件事看得很轻松很简单，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周密系统的计划，诸如如何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如何负责侦查与情报，如何具体准备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如何策划组织和宣传工作，特别是作好相关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进行善后事宜等等。所有这些均付之阙如。如此之“杀毛”设想焉有成功之理？这只能是林立果这位从未上过战场、从未指挥过军队打仗的年轻后生的异想天开，其设想的流产也是必然的。笔者认为，以中央专案组多年来在林彪一案上制造伪证、假供等种种劣迹来看，对林立果的相关指控也不排除是专案组人为制造逼供信之后的产物，所谓林立果策划“杀毛”一事应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个天方夜谭。笔者期待相关档案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林立果确实想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林立果曾对江腾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此一点应无疑义，否则林彪也不会在庐山会议上“太岁头上动土”公然打击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

笔者还想对该书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就教于方家。

（1）有关“国家主席问题”，该书作者设有专门一个小节予以论述。作者说：“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毛曾经担任过那个职务，他讨厌它的繁文缛节，而且他不需要权力的装饰。”（该书 328 页）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权结构与苏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某种不同。其相同之处是，两国都是以党领政，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或党主席（中国）居于绝对领导地位，是最高权力的核心和领导者，而党的最高领导者不必非兼国家主席不可。中苏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苏联虽然没有设国家主席一职，但不等于苏联没有国家元首。苏联的国家元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8 年前先后称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1959 年以前毛泽东身兼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搞的是大权独揽，而列宁与斯大林没有兼任这一职务，只说明他们在权力上的独裁程度尚逊于毛泽东。虽然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纯属政治上的摆设，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天有二日”

的现象，文革中的毛泽东铲除刘少奇后吸取了让位于刘少奇的教训，这一次毛无论如何都不愿重蹈覆辙，毛自己则不好重新拾起刘少奇戴过的这顶帽子，又不愿交予他人——包括他的“接班人”林彪，所以毛干脆提议将该职废除，而其所持的理由皆为强词夺理，无以服人。毛泽东的这一阴暗心理，聪明如林彪、周恩来者都不曾看透，更遑论其它人了。因此，该书作者认为“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并不准确，因为那实在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了。

毛泽东真的不需要“权力的装饰”吗？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即称：“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对此笑纳，甘之如饴。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革命国家”还是民主社会，国家的宪政体制都需要有一个国家元首。庐山会议通过的这部宪法其最后的定稿恰恰说明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权力的装饰”。换句话说，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毛泽东都要占上，还要对社会、大众有个交代。正如文革史家余汝信所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不就是‘国家元首’罗嗦一点的说法吗？这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1970年宪法草案的一个创造性提法，它更类似一个尊号，无须履行任何实质性职权。国家元首的部分职权，实际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完全浸透于宪法条文之中；与现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以人入宪，以接班人入宪；毛泽东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并无具体职务但仍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国家元首的部分实际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但却无国家元首的名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改称主任而无实际职权，这些，都是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首创的‘特色’。”（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说毛“讨厌它的繁文缛节”不过就是其表面现象而已，废除了“国家主席”一职，使毛泽东既可享有“国家元首”之实，又无需担心大权旁落，真可谓一举两得。

〔2〕该书作者在提及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时说：“事实上，在7月下旬，据说毛让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林彪办公室：‘我不当，你也不当。让董老去当，让几个

年轻人当副主席。’”作者进一步推测说：“这也可能是一种挑衅：让年轻人担当此职，有可能就此威胁到林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林彪还会继续拒绝担任此职吗？”(该书 331 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的推测应该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解。作者此处所言的时间有误，毛让秘书给林办打电话的时间不是 1970 年 7 月，而是当年的 4 月份。4 月 11 日，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几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这是林彪第一次就“设国家主席”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毛泽东的秘书高必成打电话给林办，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于运深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

(舒云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 年 10 月 25 日。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 2006 年版 221 - 222 页)另据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回忆，陈伯达说：“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可以让陈永贵当。”(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6 月版 378 页)从中共高层互动的情况来看，包括林彪在内的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毛泽东是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毛泽东出任这一职务。林彪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应是揣摸毛泽东的心态而提出，“劝进”总比贸然响应更为稳妥。毛泽东口中所言的“董必武”或“陈永贵”可当国家主席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很大程度上说的是“气话”——毛的不满是因为林彪、周恩来等人竟然都不理解毛泽东推辞国家主席职位背后的真实含义与动机。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是，毛泽东决不可能去接被打倒了的刘少奇的班，那么既然毛泽东自己都不当，其它任何人也都不能当！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意味着国家元首，名义上对军队有统率权，即使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毛泽东也不会再让给别人了。正是因为毛泽东很在意

这一“装饰品”，故毛泽东必须对此坚持到底。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讲，中共当政者的实际权力来自于执政党——中共中央，中共历来坚持的是，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这个党主席从来以“中央”自居。刘少奇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国家主席，而是来自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才可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倒台后，由毫无实权的董必武任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甚至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需要时才出来应应景，平时几乎是无事可做，因此“国家主席”在当时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花瓶而已。毛泽东口中的“年轻人”——纪登奎、汪东兴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对林彪地位的威胁，林彪又何须对此担心呢？林彪本人是中共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只须韬光养晦、按部就班即可接下毛泽东身后的大位，林彪有何理由和必要去追求这个毫无实际权力的国家主席职位，步刘少奇的后尘呢？

（3）该书作者认为：“……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紧跟主席’，还是叶群出于家庭的野心主动争取，他们都在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吴法宪将军和李作鹏将军）坚持设立国家主席。”（该书 331 页）

该书作者说林彪和叶群（出于“野心”？）都在“催促”吴法宪、李作鹏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并没有事实依据。该书作者有可能受到汪东兴等人日后根据政治形势批林的需要而“回忆”的影响，如汪东兴回忆说：“据吴法宪 1971 年 10 月 21 日交代说：1970 年 5 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 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 25 - 26 页）林彪在当年的 4 月 11 日从苏州通过电话向毛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彪还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周恩来年谱》下卷 361 页）4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周恩来传（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970 页) 显然, 政治局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的 8 月 22 日下午, 毛泽东在庐山上他的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讨论中除毛泽东外, 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 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 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 如果设国家主席, 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 设国家主席, 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 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 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 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 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 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 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说: 设国家主席, 那是个形式, 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 你们要好了, 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 386 - 387 页)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 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比林彪走得更远、也更积极。汪东兴特别突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无非还是想证明林彪有野心, 林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至于叶群的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怎么办? 往哪里摆? ——已经被证实, 那不过就是中央专案组制造出来伪证而已。

(4) 该书作者说: “8 月 13 日, 庐山会议前夕, 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此分成两派。此次争论的是宪法中要不要写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该书 331 页)

此处的叙述不够准确。吴法宪、张春桥等争论的是, 要否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写进宪法草案。(《周恩来年谱》下卷 385 页)

(5) 该书作者说: “为了尊重毛对担任国家主席的反复推辞, 林用了一个不大正式的术语(“国家元首”)以表达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意思。”(该书 333 页)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 年版) 1970 年 8 月 22

日，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定稿。林彪在 8 月 23 日讲话中称毛为“国家元首”就是依据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而来。这一用语实为中央正式通过的对毛泽东的称谓，并非林彪自己独创的“不大正式的术语”。当然，作者的这一说法总比某些人坚持的林彪提“国家元首”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210 页）明智得多。（可参阅余汝信《1970 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 692 期，2009 年 3 月 9 日）

（6）该书作者认为：“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该书 337 页）

该书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大概也是受到中共官方多年来夸大宣传的影响。中共官方在“913 事件”后指控吴法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等。但是，试问林立果在空军执掌了哪些大权？是指挥了空军战斗部队，还是任意调动了空军部队？吴法宪曾经在私下里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林立果说过这番话，吴自己承认那不过就是为了讨好林彪，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吴法宪说：“事实上，关于空军的领导权、调动权，我从没有交给过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里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凡是懂得我们党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 981 页）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和他周围的几个亲信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林立果最多也只是利用了一架 256 号专机，其实那也还是在空军专机师正常的专机调动业务范畴之内。

（7）该书作者在林彪事件一些问题上持有西方学者经常持有的“阴谋论”的看法，但是“阴谋论”大抵都是想象和臆测，与事实相距太远。我们不妨再予以

详尽的辨析。

(一) 有关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那番讲话,该书作者说:“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 1966 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 48 小时了。”(该书 332 - 333 页) 该书作者怀疑毛泽东在庐山上为林彪设下了一个圈套,静等林彪上套,从而一举收拾林彪及其同党。然而,怀疑归怀疑,但却于史无据。

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直接原因是,吴法宪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草案会议上的争论。在 8 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草案时,张对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在 1970 年的 8 月 13 日的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1569 - 1570 页)

张春桥为何敢于向林彪作挑衅,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张春桥自忖

其背后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后当然就是毛泽东。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满，江青等极左派们认为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出力最多，本应取得更多的权力，但实际上九大之后他们权力仅仅局限在文化宣传领域，政治方面的权力却十分有限，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周恩来手中，而周恩来又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张春桥等人即使执掌了文宣方面的权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制约，想发个中央文件都不能如愿以偿。面对九大后的政治局势，江青等人当然心不甘、情不愿，一有机会就要发难，只有不断挑起新的斗争，才能将已经大大趋缓的文革运动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针对张春桥的批评的讲话，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和批评。正如文革史家程光所言：“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还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毛泽东不可能预见到吴法宪和张春桥会在宪法修改草案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也不可能预见到林彪会站出来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因而毛泽东不可能预设圈套让林彪来钻。事实上，林彪自己是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也还有些犹豫，而在陈伯达和叶群的鼓动下，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的第一线。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载《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讲话前向毛作了请示，得到毛的许可。据陈伯达回忆：“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它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

374 页) 吴法宪从叶群处得知, 开会前林彪请示毛说: “有一个问题, 想请示一下主席, 就是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 张春桥反对提天才, 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 公开反对, ……”而毛表示“这个要讲一讲, 要批评, 但是不要点名。”毛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 一定是她搞的”。吴法宪说: “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 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 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793 页) 以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 在开幕式上从无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发表讲话的先例。林彪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乃合情合理之事, 并非什么“突然袭击”, 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讲话的内容, 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林彪的用意, 随即表态“这个要讲一讲, 要批评, 但是不要点名。”可见, 毛泽东并非不同意林彪讲话, 毛关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点名”, 要将“批评”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是毛泽东预设圈套的话, 应该是毛泽东鼓动林彪讲话, 要求林彪去批评张春桥(事实上, 这既不合逻辑, 也不合当时的政治情势), 而非反过来林彪向毛表示要发表讲话。因而, “阴谋论”一说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二) 该书作者另一处“阴谋论”是, “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 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 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 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 大有可能, 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 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 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该书 334 - 335 页) 该书作者似乎认为, 汪东兴在庐山上被毛泽东当了枪使, 被毛所利用, 毛泽东不仅给林彪预设了圈套, 还利用了汪东兴诱骗众多的中央委员们上当, 参与拥护林彪打击张春桥。然而, 这一“阴谋论”依然于史无据。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后所扮演的角色, 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 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 年版), 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论述。(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 载《记忆》第 23 期, 2009 年 5 月 20 日, 又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 704

期，2009年6月8日）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不仅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密切的来往，思想上有共鸣，且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可以说，汪东兴几乎就是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毛泽东及其周围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由汪东兴传达给林彪。有意思的是，汪东兴这个“卧底”并非是林彪有意发展出来的，恰恰是出于汪自己的主动。因此，汪东兴实为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是否事前就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庐山上为何放过汪东兴而将陈伯达一举打倒？

笔者认为，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极其丰富，炉火纯青，在抓大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的斗争，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林彪讲话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扬扬，根子却在中央。对于张春桥，毛泽东必须加以保护，否则一旦毛泽东松口，张春桥立即就会倒台，连带着张春桥从事的活动以及其它文革极左派也可能落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对于林彪也不能贸然予以批评，林彪是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批林会导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乱，对于政局的稳定尤其不利。而陈伯达是唯一可以被牺牲的人，陈伯达是从文革极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实力，转向林彪的军队一方更多的是因为政见上的共鸣。为了抑制这股反文革极左派的浪潮，拿掉陈伯达是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办法，毛泽东不缺“秀才、文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可以随时取代陈伯达，打掉陈伯达对林彪也是一个警告，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陈伯达成为庐山会议上首位蒙难者，这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政治考虑。毛泽东为什么会放过汪东兴？笔者认为，毛泽东并不清楚汪东兴与林彪方面的密切关系，一来，汪东兴并未卷进政治局内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争论，未曾与张春桥等人形成直接的对立和斗争；二来，汪东兴也从未涉入政治局内具体的工作，自然也不会与张春桥等人发生冲突。汪东兴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枢纽，是个负责上传下达的“御前行走”。毛泽东本人又有先入为主的习惯（这一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有很传神的叙述），汪东兴主动检讨，推卸责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另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毛泽东还非要汪东兴去办理不可，故毛泽东放了汪一马。这点，江青曾予以证实。据参加庐山会议的徐景贤回忆，王洪文曾问江青：“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江

青则说：“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219 页) 江青在自己圈子里讲话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告的状，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如果江青和毛泽东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汪东兴。日后汪东兴积极与军委办事组划清界限，嫁祸于人，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杀都与汪东兴有密切的关系。“913 事件”后汪东兴更是落井下石，积极主动地要求抓捕黄吴李邱，并充当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汪改变了毛泽东对黄吴李邱采取软禁的作法，而将他们关进秦城监狱，将党内矛盾变为敌我矛盾，这些都是汪东兴为了掩盖自己行为所采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观之，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言行是主动的，自觉的，是庐山上斗争张春桥的主角之一，绝非是被毛泽东当了枪使。因此，“阴谋论”在此是说不通的。

(三) 该书还有一处“阴谋论”是，“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希望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马脚，即假定林以为自己作为接班人，也应该像刘少奇那样担任这一职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下述材料的佐证。……”

(该书 329 页) “从毛对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人的政治游击策略来看，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主席有意诱使林彪接替国家主席一职，让其名声赶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许，日后还可以斥责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于国家主席的宝座——林彪死后，批林的材料给林按的正是这个罪名。由于林彪坚决拒绝这一职位，这一计谋没有奏效。在庐山会议上，毛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对林彪大加勉励，并做出了有关张春桥和江青的暗示。”(该书 340 页)

毛泽东有无引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的意图和言行？目前并无任何资料可以支持，于逻辑也不通。诚然，1970 年 3 月，汪东兴曾代毛泽东传话给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随后汪东兴请军委办事组诸人去汪家闲

聊，汪再次说起毛泽东的话“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说者和听者都很兴奋，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775 - 776 页)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的真心话，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后来改口说可以让董必武、陈永贵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几次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一来自己不必出任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二来也堵死了其它任何人对该职的觊觎。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辨析：“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但国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给予毛泽东一个国家元首（条文中称之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则，由一个党的主席统率国家军队，在国际上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惯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只是说不设国家主席，但他从来没有说不要国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国家元首永远是他自己。……在毛看来，国家元首代表了国家军队的统帅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虽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并没有被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副元首’的尊号。元首是唯一的，仅仅就是毛一人。”(余汝信《1970 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 692 期，2009 年 3 月 9 日)

事实上，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庐山会议前后，并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不过就是宪法修改草案当中诸多议题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就宪法修改草案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有国家主席条款，另一个是没有国家主席条款，最终通过哪个版本的草案要视毛泽东的态度而定。连大陆的党史教材也不得不承认“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本是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毛泽东讲了不设，别人就不能有不同意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208 页)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亦未曾主张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事后毛泽东猛烈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回京后被迫作检讨也与国家主席问题不沾边。事实证明，“设国家主席”绝非林彪的什么“政治主张”。

毛泽东视自己为国家元首乃天经地义，这也得到其它中央领导人集体的拥戴，毛完全没有必要对林彪来个“引蛇出洞”，毛泽东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比喻为“放在炉火上烤”，难道林彪就不会这样认为吗？毛又有何把握林彪一定会上钩呢？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出乎了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

重视始于此次会议，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遂逐步采取措施压迫林彪一系军人作检讨，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的办法拉出来、打进去，予以分化瓦解。说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 1971 年 8 月毛泽东南巡途中给林彪量身订造的罪名。正如余汝信所言：“所谓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议，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才着力渲染出来的！”“将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某一位领导人的‘反党政治纲领’，是毛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显然，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用以打人的一个工具。今天回过头来看，国家主席问题，不是林彪的心病，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的心病。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声称‘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恰恰反映了毛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刘少奇当过的，毛决不会再去当，毛不当，别人也不能当。总之，中国只能有一个主席，不能有两个主席，文革前曾有过的两位主席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并列的情形，不能再发生，不管那另一位是姓刘、姓林、抑或姓其它什么！”“所以，指称‘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无非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 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 597 期，2007 年 9 月 11 日)因此，该书作者所持的“阴谋说”并无坚实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

【史林一叶】

内蒙全面军管与余洪信事件

高 原

启之先生关于内蒙地区文革进程的力作《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竣稿几近二十年，惟成书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今年一月，由天行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

《内蒙文革实录》对内蒙文革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影响述之甚详。作者认为：“与其它省、市、自治区相较，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挖肃’为主的‘革命’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亦即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构成了内蒙古文革的基本内容，在内蒙古的

三大冤案中，死、伤、残最众的两个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都是整‘民族分裂’的产物。可以说，文革在内蒙古‘革’的主要是‘民族分裂’的命。”（《内蒙文革实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25页）

笔者更有兴趣的，是本书所反映的内蒙文革与军方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从文革前直至文革后的1978年，内蒙的历任第一把手全为军人。按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乌兰夫（1949-1966.8）、滕海清（1967.4-1969.12）、郑维山（1969.12-1971.1）、尤太忠（1971.5-1978.10）。文革前，乌拥有上将军衔，滕、郑均为中将，尤为少将。除乌兰夫外（乌在文革前是军地两栖、以地方工作为主），军人们对地方工作极不熟悉而又刚愎自用，执行政策的思维通常都是宁左勿右，这就决定了内蒙文革中的冤案严酷、惨烈程度在全国来说都是罕见的。

1967年11月，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代司令员滕海清为主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等为副主任的内蒙革委会成立。1968年1月，内蒙革委会即号召打一场“大挖乌兰夫黑线、大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同年7月，内蒙革委会指内蒙有些地方阶级阵线不清，必须普遍深入地开展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挖肃”运动，从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大冤案，挖出了十三多万人。同年11月，内蒙革委会决定批判地方干部、原革委会副主任高锦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基层充分发动群众，把混在群众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于是，“挖肃”运动又一次掀起高潮，一直挖到革委会内部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中。至1969年3月，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

（参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236-237页）

内蒙在“清理阶段队伍”中的严重扩大化倾向，连“清队”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都有些看不过眼。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即“五二二批示”），要求迅速纠正前一阶段“清队”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惟“五二二批示”又令两派群众组织形成新的分歧，致使全区各级革委会瘫

疾或半瘫痪。

在此混乱的形势下，中央没有按惯常的做法，更换未能控制局面的自治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滕海清，而是将其晾在一边，另起炉灶。中央竟然决策，对内蒙一分为五，对保留部分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军管范围不止于地方各级革委会，还包括军分区（警备区），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独一无二、未有先例的。

196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跨省区调整内蒙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将东段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辽宁省领导；西段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和阿拉善左旗分别划归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缩小，变为四盟二市，即：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237页）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于篇幅关系，《内蒙文革实录》对“12·19”决定只引用了头尾的文字，略去了具体部署的中间部分。实则该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全文如下：

鉴于内蒙古地处防修前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很快落实备战动员，实现五个统一，搞好斗、批、改，加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进程，而内蒙古目前工作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的思想状态又不统一，因此，中央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其具体部署如下：

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前指的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

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

三、六十三军由曹步墀副军长、田荫东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负责包头市、内蒙铁路局、乌达、石拐子两煤矿、河西公司的全面军管工作。

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的原定部署不变。由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和一八七师副政委王雪，并加强干部四十至五十人带五六〇团三营负责巴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巴盟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从磴口迁到临河。

五、六十五军由耿淑明副军长、靳甲夫副主任和一九五师崔毓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一九五师五八三团，进驻锡林浩特，负责锡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六、六十九军由周衣冰副军长和周发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进驻集宁，带领一个团负责乌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七、二十七军由向孝书副军长、蔡云璞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四个连负责呼和浩特市的全面军管工作。

八、二十七军由八十一师常道德副政委、郭学泮副师长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必要干部和部队，负责伊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九、各部队进驻后，要以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为指针，以“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为武器，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持“三

条原则和九个一样”，过细地做群众工作，团结内蒙各族人民，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力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内蒙文革实录》指出：“可是，全面军管却是全面左倾，说白了，就是全面镇压和全面庇护——一方面，军管会非但不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内人党’的受害者落实政策，反而把提出这种要求的苦主视为破坏战备、破坏民族团结的捣乱分子。重者重新系狱，轻者以‘有民族情绪’的罪名加入冷宫，不给分配工作。”“另一方面，以郑维山为首的‘前指’将那些民愤较大，品质恶劣的干部尽可能地调出内蒙”。（《内蒙文革实录》433页）

军管后，“前指”对内蒙的干部采取了大换班的做法。从1970年1月10日开始，将自治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区直机关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共计7,769人送入中央办的唐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各盟市干部3,337人分别送入河北省柴沟堡和山西省阳高等地学习班。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各盟市革委会的工作，实际上由“前指”和各军“领导班子”取代。在学习班里，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并规定学员不准通信；不准会客接待亲友；不准用民族语言书写和会话；不准串连；不准私自出入，以隔断干部与内蒙地区的联系。（见《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240-241页）

借军管之名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最甚者，当为负责巴盟地区全面军管工作的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据军队方面的资料称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执行军管任务期间，依仗权势，采取思想腐蚀、物质引诱、持枪威逼等手段，强奸、奸污、侮辱妇女33人。余还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非法捆绑、扣押、批斗、打骂部队、地方的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余所犯罪行被揭发后，军党委根据北京军区党委的指示，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余犯对教育帮助他的同志视若仇敌，图谋行凶报复。（1972年）5月18日凌晨，余犯企图行凶杀害军长、政委未逞，开枪打死军政委曹步墀同志的爱人邢玉荣，打伤军副政委杨兆魁和战士张彦平后，

携械潜逃”。

余洪信是在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市内的六十三军军部行凶杀人的，行凶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军长、政委，此事闹得不是一般的大。军方打破“家丑不可外扬”的惯例，立即通告地方协助捉拿归案。国家公安部旋即两度向全国发出“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通缉令”，其中第二号“通缉令”称：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 1.8 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 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第二号“通缉令”发出日期可以得知，案发十一天之后尚未有余洪信下落的任何头绪。惟后来发现，余其实并未逃得太远且已自杀身亡，军方资料称其“畏罪自杀在山西榆次市郊区的麦田内”。

余洪信事件暴露了军内的诸多问题。当年8月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在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称：“1970年12月，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今年5月，六十三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委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二十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余洪信事件表明，如果说“三支两军”在1967-68年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1970年后即完全走向了反面。更重要的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无疑使毛泽东极大地增加了对军队的戒心。故此，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省、军级单位发出毛批示“照办”的《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称：“最近，毛主席建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内称：“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

而身兼内蒙“前指”第一把手的郑维山，早已于1971年1月华北会议结束时因北京军区改组而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黯然下台。内蒙全面军管实则于1971年5月随着中共内蒙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内蒙革委会“补台”而宣告结束。《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发出后，内蒙全区二千六百多名“三支两军”人员，于1972年始至1973年7月份分批全部撤出“三支两军”。

2010年8月

【访谈】

胡杰访谈

《记忆》编辑部



按：胡杰，国际知名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1958年生于山东济南。15岁开始习画。1977年参军，1986年毕业于上海空军政治学院。1989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1995年拍摄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画家生活》。从1999年辞去公职，至今，一直从事“用镜头记史，以影像思想”的纪录片创作。其主要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国营东风农场》、《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其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好评。2001年6月，北京大学举办胡杰纪录片展映。2002年3月，《严震的婚事》获“中华青年影像大展”最佳编辑奖。2003年3月，在北京参选“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同年8月，在法国巴黎参选中国纪录片展映。2004年2月，在德国波恩参选“东西方艺术与个人身份”展映。2004年6月在广东美术馆展映。影片《我虽死去》2008年获第一届华语纪录片影展（长片组）冠军，在第四届 REEL CHINA 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获评委会奖，并参加2008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展”。2009年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其作品DVD（《平原上的山歌》、《在海边》）已由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

记忆：你在接受吴菲的访谈时说，“在中国缺少用影像来展示思想的人。我觉得我要做这样一个工作，我非常喜欢思想的表达。”我们很想知道你所

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胡：这种表达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的语境下，那些先驱者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坚守的。第二，我们怎样面对他（她）们的思想和牺牲。林昭是一位女大学生，王佩英是一位女职工，她们因为面对“皇帝加马克思的新衣”独立思考，并把思考表达出来，就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这些代价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

记忆：是啊，你的思考也是历史的追问。在所有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中，能够像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恐怕不多。你能否结合你有关林昭、卞仲耘、王佩英的这三部影片介绍一下你对历史、对主义、对人生道路的具体理解和评价？

胡：这三部影片的共同之处是主人公都是女性并都惨死在文革。就是从信仰某某主义，到被某某主义所杀死。但她们的生命形态各不相同，《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的母亲王佩英》这两部影片，我着重把她们的生命轨迹放在她们既宏大又细微的生活的背景里，通过历史的变化呈现她们独立思考的内容与价值，她们性格的坚毅与倔强。同时，我更希望通过记录她们的惨烈牺牲来唤醒人们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好在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离我们不远，见证者依然活着，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采访。

这三部影片也仅仅是一段历史的碎片，仅仅是在这个大历史中的个别人命运。这类纪录片只是努力在寻找残存的、但无法复原的记忆。就我个人而言，就是对那些牺牲者的发现和感知。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我对她们的理解是通过不断的采访逐渐形成的：强大的专政机器可以篡改历史、改造灵魂，可以消灭无数个林昭、王佩英这样弱小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强大的专政机器无法撼动她们的精神？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们？使她们无法变得低声下气、低三下四。她们的故事也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民族拥有林昭这样的女性，有王佩英这样的母亲站立在那里，即使是站在一片贫瘠的荒原，也会使正义和良知薪火相传。

《我虽死去》和上面两个影片不同。它讲述的是文革初一位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的暴力事件，反映出她的丈夫王晶尧是怎样用照相机记录下这段生活的故事。但我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就是站在受害者的位置向历史和现实追问。

“我虽死去”，我的学校还好吗？我的学生怎么啦？她们怎么突然变成了打人凶手？现在的学生知道你们的母校曾经打死、斗死、逼死九名教师吗？“我虽死去”，打死我的学生们有人出来说出真相的吗？人们是不是知道北京“红八月”的大屠杀？“我虽死去”，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在苦难中醒悟？并走出梦魇。“我虽死去”……?它是不断地多层次地追问。

记忆：你这么一说，我才理解你为什么给这个片子起这个名字，原来，“我虽死去”这四个字包含着无数发人深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又藏在你的不动声色的拍摄之中。影片的后半部，情感浓烈且富含思想——王晶尧先生追忆他年轻时信仰“激进民主主义”，组织读书会，与同伴们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背景音乐是黄河大合唱中的《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部片子的最后，王先生对着镜头说，他如果死了，一定要在骨灰盒上写上八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影片在这时被推向了高潮——思想和情感的高潮。我相信，能够如此处理影片的人，一定对王先生所信仰的“激进民主主义”，对“生于梦想，死于梦想”的遗言有着深刻的理解。你能否把你的理解告诉你的观众？

胡：这其实也是“我虽死去”的一个追问：也就是 100 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王晶尧年轻时，是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在采访中，王先生对于“免于恐惧的自由”记忆犹新。那是他 1944 年办的反法西斯战争展览的主题，目的是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试想，那可是在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的战略后方成都啊。国民政府怎么能允许？就这个问题，我还采访过 1944 年在重庆积极组织学生运动，时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谢韬老人和他

的老伴卢玉。谢韬老人说：我们当时是有很大大民主空间的，可以学习各种主义，还痛骂蒋介石。我们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选择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怎样实现民主社会我们并不清楚。卢玉老人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口号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幸福的国家，可是弄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无数政治运动的折磨之后，晚年才安定下来。我想，王老要写在骨灰盒上的那八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是对他痛定思痛后又回到的人生价值的原点。那就是：民主的梦想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制度。

记忆：在纪录片中，思想的表达并不是受访者单方面的事，它还与采访者有关。采访者要善于引导受访者说出思想，还要在他语焉不详的时候适当地追问他，让他把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三部片子中，你的提问很少。在受访人谈话的时候，你既没有诱导，也没有追问。我们想知道，这是你的风格，还是你的忽略？

胡：采访中的提问是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超出你的预知。他们常常突破了我预设的提问。但我还是有很多提问的，只是后期编辑的问题。我的工作习惯是尽量倾听和记录。但绝对少不了提问和追问，因为你挖掘的深度在支撑着影片。

记忆：电影被称为“遗憾的艺术”，纪录片当然也是如此。你对这三部纪录片如何评价，你有什么遗憾之处？

胡：如果说遗憾，三部影片都有很多遗憾的地方，这更多是体现在资料的缺位和采访对象的缺位。比如在《我虽死去》中，王晶尧老先生给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打电话，请她们接受我的采访，都被对方回绝了。当时，王老先生用的是免提，而我就在他的旁边等候。等到一圈电话打下来，都被回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傻傻地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情节。怎么不把这种拒绝拍下来呢？！

但如果说是“遗憾的艺术”的话，我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其实，这个遗憾是双方的，是导演和观众共同的，这种遗憾其实在影片中又是一种美。因为你在采访和编辑上都尽力了，但那个缺陷依然存在，而且这种缺陷观众是可以感知的。因为你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证明的，孤独的，设备是简易的，没后援的，甚至是危险的，必然在影片中留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缺陷，这是我理解的纪录片的“遗憾的艺术”。

记忆：你这个理解很独特，很有个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让我心中涌起一种同情，一种悲壮感。我们虽然行业不同，但是，也常做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不过，有些事是可为的——看《我的母亲王佩英》时，我特别想让你去采访那个把王佩英赶出精神病医院的吴大夫。我想看看，当他知道他是王佩英间接的杀害者时，他是什么表情。可是，你没有采访这个关键人物。连一句采访未遂都没有，这真让我遗憾。

胡：是的，这也是我很想采访到的一个人。据说这是一个出身不好的 1949 年之前的医生。是那种夹着尾巴做人的人。数年前患脑血栓如植物人。现在也不知搬迁到何处。如你所说，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和精神病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医生脸上读到什么，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你还记得在《寻找林昭的灵魂》影片开头，提到的那个提篮桥监狱的医生吗？他叫翁长康，九十多岁了，是翁同龢的孙子。因为他在监狱医疗所同情林昭被劳教三年。我们访问他的时候，他只是微笑，似乎以前的事他都忘了。

记忆：请你谈一谈对美国的“直接电影”，苏联罗姆的纪录片艺术——你肯定看过他的代表作《普通法西斯》。

胡：产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直接电影，是相对于 50 年代法国的真实电影而说的，我觉得它真正反映了电影的本质。“直接电影”很纯粹。但就它们“都

信守真实，投身于社会写实观察”（Richard M. Barsam 语）这方面，这两种形式我都喜欢。我也都尝试过。我的影片《远山》（1995）和《媒婆》（1996）直接电影的成分就多一些，我不动声色，任事态在眼前发展。而我与艾晓明教授合作的电影《中原纪实》和《关爱之家》（2007）真实电影的成分则很强烈，我们不仅拍摄电影还介入现实，帮助老百姓维权。并把这一部分也编进了影片。我不坚守某些形式。其实就现在而言，非剧情片在技术和形式上已经相互借鉴，彼此杂糅。

谈到罗姆，恕我直说，我不喜欢这位被称为“思想电影”的大师。当然，他在 1956 年的苏联，用电影形式揭露法西斯本质是要勇气的，就此，我向他致敬。但是，从艺术上讲，他的这部电影完全是建构在解说上，那个解说有着绝对的权威性。那是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甚至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一个独立于那些系统之外的思想者的声音。

罗姆的编辑手法并没有在他的前辈维尔多夫建立的电影视觉编辑美学上有所突破。尽管有些对立与幽默的剪辑手法，现在看来其实很笨。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罗姆当时的处境，但 1956 年苏共 20 大以后，苏联依然是一个极权社会，这个《普通法西斯》指向的是纳粹德国，不是指向自己。我觉得，把刺入别人身体的刀转过来刺进自己肉里，才会有深度。艺术的探索 and 思想的探索不能混为一谈。

罗姆的代表作《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都是很好的电影艺术品，但那仅仅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史教科书，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就不如同一个时代产生的《日瓦戈医生》（1956 年）和《古拉格群岛》（1958—1967 年）那么独到的深刻洞察力和艺术的思想的价值。顺便说一句，“我虽死去”就是引用《日瓦戈医生》结尾的一句诗。

记忆：凡是内行并认真研究了你的作品的人，都能看出来你对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独创性借鉴。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你会对罗姆持如此看法。其实，仔细看看你的片子，就会理解你为什么对建构在解说上的罗姆不满。你是崇尚真实性的。不过，我得替罗姆说句话。《普通法西斯》是用希特勒宣传部留在东欧各国的纪录片做素材，重新剪接编辑而成的。把这些来自不同影片的胶片连接在一起的只有编导的语言。换句话

说，罗姆严重地依赖解说，是影像素材和他的制作方式决定的。尽管如此，你能持如此独特的看法，说明你有一套自己的纪实美学。你能否讲一讲你心目中的纪录片的艺术，换句话说，你的美学追求？

胡：2005 年夏天，我接到过一位女性的电话。她说：我是一个在农村服务的志愿者。她问：你拍的电影有没有给农民看的。让农民知道怎样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对她说：我没有拍过这样的影片。但谢谢你给了我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讲这个事情，好像和你问的对纪录片艺术的理解没有关系。其实我想说的是，所谓纪录片的艺术，是和那个在现场的纪录片工作者的价值观以及独特感觉有直接的关系，你首先在内心有一个充分的拍摄理由，你才能感知那个拍摄现场的精神磁场。你要把握什么，你一定有独特的感受，对这种感受的把握，就会形成你纪录片的艺术。这个问题谈起来太抽象了。

如果说我的美学追求的话，就是深入被遗忘的历史并质朴呈现。

2010 年 8 月 22 日

【蓦然回首】

1966 年 8 月 28 日

冯敬兰

提起这个日子，我姐总是这样开头——那天下班我走进前院，南屋大叔正站在房檐下，他说：“大姑娘（重音在大字），快把你的头发用卡子别住吧，这几天外边挺乱的。”我刚烫头没几天，花儿挺多的。我说：“知道了。”没想到，那是南屋大叔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南屋大叔好像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呆在家里。平时他戴一金丝眼镜，头发有些稀疏却纹丝不乱，永远是腰背挺直。夏天穿一件本白的纺绸半袖衫，银灰色吊

带西裤，皮凉鞋也是那个年代有身份的男人穿的款式。他扇凉用折扇而不用蒲扇。他管街坊们叫张先生李太太，不管对方是卖苦力的壮工或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大人们私下里说，他是国民党军官，右派，被劳动教养过，因此我有些怕他。他见到我经常问的是作业难不难啊？考试成绩怎样啊？后来我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大叔知道我是好样的，便不再问我学习的事。大婶比大叔年轻不少，听说是二太太。不知道她是否过过撒娇取宠使小性的日子，留在我印象里的大婶，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她无冬历夏在大华电影院看自行车，夏天晒得脸色黑红，冬天戴着棉套袖，两手背满是冻疮。1966年8月28日傍晚，大叔提醒了我姐，不要顶着一脑袋卷儿上街，可是却没想到厄运正向他逼近。

半夜的砸门声突如其来，只有电影里的日本鬼子和国军才会这样嚣张。我家住后院北屋，大人们心惊肉跳一时辨不清方向，不敢开灯，不敢长出气，悄悄掀起一角窗帘，天光里发现对面（前院北屋）的房顶上影影绰绰有了人。我想起了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夜袭汉奸什么的——那时我已经读完了大部分的革命战争小说。接着就是嘈杂的声音涌入前院，听到了北屋老三带着哭腔的声音。20岁的老三是小学老师，老实本分胆小，连蚂蚁他都和人家说话，生怕得罪它们，想必是他给开的门，劈面就挨了几皮带吧。老三的父亲自然灾害中被调到内蒙赤峰，刚去不久就死了。姐姐农大毕业自愿去了新疆库尔勒，哥哥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50多岁的母亲和保姆两个老太太。听到了老三的哭声和皮带抽打什么的声音，不一会儿就消停了。事后听说是找错人了，老三白白挨了打。

接着砸门的声音再起，又来了一拨儿。他们撞断门闩长驱直入，直奔南屋，有的在屋里挖地找变天账，有的把大叔揪到院子里施行酷刑，直到没气了。按说大叔军人出身，正是壮年，身体素质好，光是拳打脚踢皮带抽，不伤及要害不至于毙命。听说他口渴难耐，乞求给一碗水喝，他们把胶皮管子直接插进他的嘴里，打开了水龙头，结果炸了肺。还听说他们用一壶开水直接灌他，大叔是烫死的。这都是街坊根据窗帘后的偷窥和隔空“监听”私下猜测的，谁能忍心去问死者家属呀？

那一夜，左邻右舍、前院后院，整条小胡同，谁家不屏息静气，藏在窗帘后面打哆嗦呢？

清晨，我姐经过前院倒脏水（下水道在大门口），一眼就看见南屋大叔躺在

当院的破砖地上，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光着上身，脸上盖了一块布。一股凉气从姐的脚心窜到头顶，她连呼吸都停顿了，还好，没把脏水桶扔了。后来，我也蹑手蹑脚地去看，大叔脸上盖的是一幅丝织的外国领袖像（后来听说是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再晚些看到的是我的外甥女，姐姐七岁的女儿。那时南屋大叔已经被停放在大门口堆放杂物的一间小房里，小姑娘看见的是一双伸在外面的惨白的赤脚。

那天早晨，姐用了不少黑卡子把头发的卷儿统统别在脑后，29岁的她，看上去老成持重足有四十多岁。南屋大叔此生和姐最后的对话，让她记到了现在，今年我姐73岁，一说起这个，她就长叹一声说，大叔跟我说话的表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真没想到是他最后的话。

大街上到处是“破四旧”的红卫兵，胳膊上带着红箍，腰里扎着皮带，男男女女呼啸而过。他们见长辫子就剪，见高跟鞋就剁，当街撕毁女人的布拉吉、旗袍或裙子，给街道改名、砸商店牌匾、抄家贴封条。往日背静的小胡同里，常常传出人的惨叫，那是他们在惩治“黑五类”。

8月里学校没了秩序，我母亲经常不许我去学校。她说：“红卫兵全是些讨吃鬼，你看看好人家的孩子谁是红卫兵？”我连同学们8·18去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事先都不知道。当然，即便我按时到校人家也不会让我去。我因“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仇视干部子弟”早就被批臭没人答理了。1966年8月28日以后，母亲不说，我也不去学校了。

奇怪的是，我的记忆定格在了那个早晨。大婶和四个孩子后来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1968年6月，我下乡去了北大荒。有一年回来，听母亲和姐说，南屋大叔的两个儿子从内蒙兵团回来看过她们，母亲还给哥俩包了饺子。关于大叔之死，我听到了新的说法，打死大叔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一个原因是老家有人检举，另一原因是他家埋了变天账。检举变天账的是他家隔壁的老太太，她看见大叔的儿子把院里的方砖搬进屋里，怀疑一准是埋了变天账，再用新砖砌好呗！其实是他们有时笼火，在砖地上劈柴，久而久之就把砖劈破了，换一块新的而已。前院老太太警惕性高，当年错报“敌情”的事时有发生，我家也曾受害。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四处打听，特别想找到大叔的孩子们，那三个男孩可

以说是与我比肩成长的发小啊！半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这么熟悉的声音，我脱口而出也叫了他的名字。他是大叔的长子桐城，比我高一届，文革开始上高一。我们电话里聊了一会儿，我终于搞清在我下乡之前他们全家就回了河北保定的老家。他说，我们走那天你一早就来我家了，还问怎这么快就走呀？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桐城心气平和地告诉我他现在叫卫东，他们的姐姐为了保护三个弟弟，给他们分别改名卫东、卫国、卫民。他和老二卫国在老家仍按北京知青待遇，被批准去了内蒙兵团而不是留在农村干活。他在内蒙干得不错，是连里的会计。后来落实政策全家都回北京了，他和老二入了党，当了干部。我忍不住还是提到从前，问那天夜里来的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文革后他去找过，人家说学生早都走了，上哪儿去找？

后来，我俩相约去从前的“老家”看望老三。我老远就看见了桐城，他站在国家大剧院旁边的便道上，也同时看到了我。40 年未见，却能一眼就找到彼此少年时的样子。我们的“老家”如今和人民大会堂隔着大剧院的巨蛋遥遥相望。40 多年前的这个在天子眼前的小胡同，发生过最野蛮最悲惨的故事，大叔的死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走进破败的小院，前后院邻居换了几茬，只有老三还在，前院是他家的私房。老三鬓发灰白，连长寿眉都白了，其实他还不到六十五。我们三人的长辈都已下世，触景生情，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我谨慎地提到了 1966 年 8 月 28 日。老三说：“他们是从我们家要的开水，把壶提走了，谁能想到——嗨！”是的，谁能想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的一帮畜生竟然用开水灌进大叔的嘴里。桐城说，那些人走后落下一张纸，上面写了二十多个名字，我看了那个名单。一会儿有人又回来找，还挺横地问我们看了没？我们说没看。

1966 年 8 月 28 日的黑夜，全北京发生了多少血腥的暴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仅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这伙人要“解决”的，就有二十多人。

他们的名单是从哪里来的？

最近，我又去看望了桐城。他和老伴早早就准备了饭菜等着我。他的妻子比我俩年轻几岁，朴实、开朗、快人快语，是当年他从老家找的，跟着他去了内蒙兵团，又辗转回到了北京。

桐城说，别老想着过去的事了，都过去了。保重好身体，好好过晚年吧。是

啊，那么可怕的记忆！大叔的惨死，对于我这个邻居的小孩，都留下了终生不愈的伤痛，何况他们？

南屋大叔名叫许兆麟，终年 54 岁。曾是傅作义部队的军需官。在我的记忆里，大叔没有工作，老在家呆着。桐城告诉我，他与人合办过一所会计学校，文革前就被停了，改为幼儿园。那么，家里的日子就靠大婶看自行车的微薄收入吗？……我一直想问的许多事，决定永远不问了。

【蓦然回首】

歌咏比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戴为伟

1968 年，我四岁，妈妈工厂发戏票，我和妈一齐看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这是我第一次看戏。回家后，同院大些的女孩来给我家送新编好的五角星形状毛主席挂像，我人来疯，跳到吱嘎乱响的破木板床上，抓起家家都有的红宝书，朝墙上的毛主席像有节奏地挥动着，嘴里“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了一会儿，接着便无师自通，扯着嗓子显摆开了：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妈嫌我闹，一把扯我下了床：“好的不学，丫头家的，像什么样！”我的表演欲望被妈遏制了。

上小学，我正式学了第一首歌：《火车向着韶山跑》。

车轮飞，汽笛叫，
火车向着韶山跑，
穿过树林越过河，
迎着霞光千万道，
嗨！
迎着霞光千万道……

现在想来，这歌词一定是个四川或西部哪个省份的人写的，因为去韶山能迎上这道霞光，只能是由西向东，而我们从北京到韶山是无论如何迎不到这霞光的。当然上小学时没这么想过。

学校课间操时间，广播里最常播放的歌基本只有《小松树快长大》、《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再有，耳熟能详的，多半是京剧样板戏唱段和《闪闪的红星》电影插曲。

我三年级时，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们班得了第一名。这时，所在地区（街道）学校要办校际歌咏比赛，学校指定我们班去参赛。

可能是为了比出个子丑寅卯，上级部门规定每支参赛队必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嗨！就是好！

就是好呀！

就是好！

就是好！……

这时，学校的音乐老师，胖胖的吴燕笙，是我的班主任。少年时的吴老师参加过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现在虽然不教唱歌，改教语文，但歌咏比赛让吴老师重又怀念起老本行。她热情很高，我们班独唱、合唱、齐唱、男生唱、女生唱、高音唱、低音唱……吴老师使出了看家的本领。

临近比赛前几天，吴老师索性把我们除政治、算术以外的所有课都停了，整天领着我们唱“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预备——唱！”唱到上午第四节课，我实在是饿得慌了，大概同学们也都如此，唱起来气力明显不如第三堂课。

吴老师开始训话：“大家注意，我看有个别同学精力不够集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吴老师跺了下脚：“注意这个‘嗨’要唱出气势，要让人感到振奋！你唱着都没信心，听的人能有信心吗？再来，无产……”

“停……停，停，就——是——好！这四个‘就是好’应该处理好，第一个‘就是好’要坚定振奋，第二、第三个‘就是好’，要有一种活泼、欢快、肯定，由内心向外抒发出来，‘就是好呀，就是好——’”吴老师眼神飞扬地示范着，手情不自禁地打着节拍。

“第四个‘就是好’，注意，要唱出理直气壮，要让台下观众听出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定不移的肯定态度。注意了，这四个‘就是好’的层次……再来一遍……”。

终于，在练了一个多月后，我们班在地区歌咏比赛中粉墨登场了。

各学校歌咏队上台后的第一首歌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唱的水平、方式大同小异。以我练歌的体会本能地感觉到每个上台的孩子都在“就是好”这三字上下足了功夫。

伴随着与人较劲儿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革”文化命的运动徐徐落幕。

前几年，书店里卖《李岚清谈音乐》（大概是这个书名），我心想，一届高官究竟有多少时间来探究音乐的美妙呢？或许是音乐界也有个与大人物同名的专家也说不定。

一天，偶开电视，果见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李岚清大人在讲台上为莘莘学子讲音乐。在讲到小泽征尔在中国第一次听《二泉映月》时，李大人说了一句让我铭心刻骨的话：听着听着，小泽征尔突然跪在地上，虔诚地双手掩面。一曲终了，他抬起头来，含泪说道，这样的曲子只能跪着听啊。

我问自己：李大人一定唱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怎么评价它呢？要是小泽征尔听到这首歌，会做出什么姿态呢？

这两个问题，至今无解。

【蓦然回首】

一个人有动脉

陈仁德

1968 年下半年的一个深夜，一阵急促的哨音把我从梦中惊醒，凭经验，我知道这是“革命群众”在紧急集合，多半是又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那时我才十来岁，喜欢看热闹，一翻身便下床跑了出去。

我家后面的大操场灯火通明，成百上千的人揉着惺松的眼睛迅速汇集在一起，神情严肃而虔诚。人们交头接耳，十分谨慎地相互打听：“喂，知道今天发表的是什么最新最高指示吗？”“谁知道！”其实知不知道不要紧，关键是“忠不忠看行动”，一听到哨音马上起床赶来就行了，这叫“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

一会儿，锣鼓响起来了，鞭炮也放起来了，操场上一片热烈气氛。

一个手持铁皮话筒的人示意锣鼓暂停，然后他登上台阶，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一字一顿地说：“红色电波从北京传来喜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

全场顿时爆发出一阵“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声浪。声浪之后，手持铁皮话筒的人开始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宣读“最新最高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

接着，他激动万分地说：“革命的同志们，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他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很快，庆祝游行开始了，人们肩并肩走上大街，浩浩荡荡犹如长蛇阵。这时“话筒”开始领呼：

“一个人有动脉！”

于是千百人便举起红宝书齐声高呼：“一个人有动脉！”

接下来“话筒”领呼：“静脉！”

千百人又齐声高呼：“静脉！”

然后便依次是领呼：“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

齐呼：“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

领呼：“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

齐呼：“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

……

“话筒”喊一声，大家就跟着应一声。全部喊完后，又从“一个人有动脉”开始，直到游遍全城。参加游行的人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学生等，一个个豪情满怀热血沸腾的样子，好像刚刚发现了自己身上竟然有动脉静脉似的。

第二天我才搞清楚了“最新最高指示”的全部内容，原来在那段话后面还有这样的内容：“……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神州大地上的“吐故纳新”运动便开始了，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被开除出党，王洪文等进了中央。

事过四十余年，我还不时会想起人们高呼“一个人有动脉”的场景。

【简讯】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正式出版](#)

[舟 人](#)

2010年初，有关重庆沙坪公园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被评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消息见报后，引起许多人对那段逝去的历史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人想知道重庆那场惨烈的大规模武斗到底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和特点，不了解文革历史的人想了解武斗是怎么回事，人们为什么会为了同一个领袖、同一个“革命目标”而相互残杀……

何蜀积多年调查采访和研究心得写成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初步的解答。作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与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种，此书最近已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全书共九章 22 万字。为了向读者讲清楚重庆大规模武斗的来龙去脉，该书从第一章“北京吹来动乱风”开始，详细叙述了重庆文革大动乱是怎样发生的，群众性造反高潮是怎样兴起的（第二章“造反之火燃向全社会”），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是如何爆发的（第三章“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原本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怎么会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第四章“两大派分道扬镳”、第五章“都是‘复辟逆流’”），并详细叙述了大规模武斗的发生、发展与终结（第六章“武斗在制止中升级”、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八章“从停火交枪到解散组织”），最后在第九章“重庆大武斗面面观”中分别对“武斗中的军队”、“武斗中的专业武斗队”、“武斗中的‘烈士’”、“武斗中的虐待与杀俘”、“武斗中的‘第三条道路’”、“武斗中的报纸、广播”、“武斗中的文艺”、“武斗时期的市容”、“武斗时期的市民生活”等专题，多角度全方位地对重庆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相关史实进行了梳理、考察与分析。

此书在 2006 年即已竣稿，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始终无法在大陆问世。在这期间，作者又对全稿反复推敲，不断进行修订补充。此书在香港的出版也是一波

三折：2008 年作者将书稿交给香港一学术性出版社，该社先是告知将在两个月内完成评审，但此后却一再拖延搁置近一年之久，最后在作者反复催问下才启动审读程序——请瑞典著名文革学者沈迈克审读。沈迈克很快便写出评价很高的审读意见，并建议尽快出版。然而不知何故该出版社仍然将书稿束之高阁，并且不向作者作一个字的解释说明。直到 2009 年底作者得知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征集“当代中国研究”书稿，才将书稿转去。该公司审读后，迅即付梓。

在中外文革研究著作中，此书是研究文革武斗的第一部。大陆文革学者徐友渔、启之分别为之作序（徐友渔序已在《记忆》2008 年第二期发表）。

【书评与序跋】

默默耕耘的成果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启 之

这本书有三个关键词：毛泽东、武斗、造反派。（造反派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稳健派，另一类是激进派。前者反对武斗，后者主张武斗。本文所说的造反派指的是后者。参见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年）它们组成了一个历史纽带，纽带的两端是人——发动文革的伟大领袖和追随他的亿万激进群众；中间是事——大大小小的武力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残、尸骨和坟墓。通过对这些人物、事件的详实叙述与精辟分析，作者为文革的主体阶段（1966---1969）梳理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链条。

这个逻辑链条为我们揭示了毛泽东、武斗和造反派三者间的关系——毛泽东既是造反派的后台，又是造反派的杀手；既是武斗的支持者，又是武斗的终结者。武斗是中共操控的群众运动所达到的最高形式，对于毛泽东来说，武斗是他完成“天下大乱”的工具——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中友协代表团对此做了坦率的说明：“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不疼不痒，太文明了。”

利用这个工具，毛泽东达到了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支持革命左派，重新建党建政的目的。时至今日，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仍无法理解，1968年春，在中央已发布了禁止武斗的“九五命令”，号召大联合，且大力“围剿派性”的情况下，为什么全国上下会再次掀起“全面内战”的高潮。本书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早在1968年4月，毛泽东就制订了对付武斗的“四不方针”——“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一未曾公开的“战略部署”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停止了对清华大学武斗的干预。

“在武斗愈演愈烈，死人的事已经不断发生之后，处于劣势的四一四总部组织人马到北京市中心去展开‘文攻’。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手段：奔走呼号、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甚至抬尸游行，要求中央和北京市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实行军管，中央和北京市就是不闻不问。”作者引用了清华大学四一四“理论家”周泉缨的话：“中央的这种政策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支持蒯大富，让他放开手脚，坚决果断地用武力解决414派的问题，从而一统清华大学的天下……”

作者随后指出：“在毛泽东还指望他所欣赏的‘左派’能够以武力强行征服对立派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为制止武斗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的。而各地的造反派，特别是被当地驻军认定为‘左派’的一派群众组织，正是受到了这种秘而不宣的“战略部署”的纵容和鼓励，才得以把‘全面内战’的野火燃得更为炽烈。”（本书第八章第五节）

对于造反派来说，武斗具有多种功能——它是扩大势力的途径，是压倒对方的砝码，是革命意志的试金石，是报仇雪恨的英雄榜，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实验场，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浪漫曲……。而这些功能大多是以“自卫”为号召，为借口的——为悼念两位“死难烈士”，1967年8月2日，在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8·15战报》（第三十四期）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放下屠刀，也不会立地成佛的！当敌人举起大刀、长矛、枪支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祈祷，不能哀求，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武装起来，照样办理，拿起大刀！拿起长矛！拿起枪支！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自卫！自卫！！自卫！！！”

（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然而，直到文革结束，人们才发现武斗的另一个功能——它是“造反派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篇章”。(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版第95页)它在为毛泽东取缔群众组织提供了充足理由的同时，也给造反派的履历涂上了不可磨灭的反人道污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友渔认为，“手执长矛、冲锋枪，杀红了眼的造反派”与“德国法西斯的青年纳粹运动十分相似”。(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页)

作者无限感慨地告诉我们，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下：“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那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经满怀豪情地‘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本书尾声)

在文革研究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最复杂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似乎倾向于“利用说”，即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大陆文革学者周伦佐不同意这一观点。在其富有创见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周氏颇有信服力地提出了“契合说”，即造反派与毛泽东具有某些“利益契合点”。周氏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具有鲜明的“非制度化”个性，“喜欢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欢建立团体而非隶属其下，喜欢制定行为规则而非受其束缚。”(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第176页)另一方面，毛泽东怀抱着以“兴无灭资”为表象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社会理想。(出处同上，第186页)造反派身上有两个东西，“一是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二是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这正是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出处同上，第194页)文革之初，是造反派与毛泽东的“蜜月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政治目的，与造反派反等级、反迫害的心理相契合，从而上演了一出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驱逐工作组，抢夺“黑材料”，抗击保守派的活报剧。毛泽东要摧毁各级修正主义，重新建党建政，与造反派的反官僚、反权威的心理相契合，群众组织遂风起云涌。然而，这个“蜜月”是短暂的。其原因和过程，本

书作者为我们做了生动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剖析。

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作者对造成武斗的思想源头做了深入的思考：“组成武斗队的多是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在‘文革’前十七年接受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从小崇拜的是解放军英雄，他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小说中或电影里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十七年教育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它制造的是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观念，培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淬炼的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钱理群语)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操。这种观念、心理和感情如浸油之薪，只待星星之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犹如一把烈火，投向了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浸油之薪轰然而燃，大火熊熊，迅成燎原之势。武斗就是这燎原大火释放出的最大能量——既然这场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那么，武斗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作者精辟地指出：“在这里，当年的造反派已经把自己比作昔日与执政的国民党作斗争的共产党了。与之相应，对立派显然就被视为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了。当时两派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这也是武斗得以打起来并且越打越大的思想基础。”作者提醒世人，正是十七年的洗脑，将这些热血青年推向了互相残杀的荒谬境地。

在研究文革的中外著作中，此书是第一部研究武斗的专著。武斗是群众组织的行为，群众组织是群众运动的产物，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大众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曾这样设想，如果作者转换一下角度，以其丰厚的史实积累、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执着的钻研精神，对这些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做一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另一个第一部——第一部研究文革群众心理的专著——摆在我们面前。它将为文革研究开辟新天地。它将与国际接轨，提升、深化文革研究。

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一不是群众运动的产物。经过欧美学者的不懈探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些运动的共同点：在群体中，越是激进的口号，越容易被接受；越是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越受欢迎。一个胆小、善良、理性且守法的个体，一旦成为群众运动中的一员，就完全可能变

成另一个人，一个目无法纪，杀人放火，狂热偏狭的暴民。还有，一个制造冤狱的群众运动，同时也会成为净化道德的教堂，那些在广场上向反对派行凶的恶徒，在自己的队伍里则是一位道德高尚之士……。(出处同上，第 194 页)

这些可以称之为定理的心理症候，在文革中随处可见。我们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那些含糊的、混乱的、没有分析和限定的只言片语，会成为群众运动的指南。为什么重大八一五中的稳健派呼吁放弃武斗的理性之声，群众置之不理。反之，激进造反派毫无理性地两次冲击保守派改过自新的会场，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为什么在重庆大武斗中，双方的专业武斗队都清廉自律，除了享受“供给制”的待遇外，没有任何“物质刺激”。他们看不起参加武斗多记工分的农民，对睡在身边的女性秋毫无犯……

历史真相的探求始终饱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压迫——史料严密封锁，会议严禁召开，文章无处发表，书刊无法出版，有单位者常受领导打压，无单位者颇烦国安“关照”。商家用“红色经典”谋利，学府却奉文革为禁区。官府鼓吹“一元化”，历廿年而不减；文人趋附“主旋律”，经“六四”而不悟。电视以百家之名，行一家之实，逃避至古代文史之中；有司以名利为饵，驱学者入彀，歌吟于紫台魏阙之侧。掩盖真相，歪曲历史，鼓吹遗忘已成为学界的“潜规则”。

正是此种语境造成了这样的奇观：经历文革者，滔滔者天下皆是；直面浩劫者，寥寥然举世罕有。而矢志研究者，则凤毛麟角。这些“毛角”之人，在世人眼里是怪物、畸零人、不识时务者。在官方那里，则被视为捣乱分子、不安定因素、心怀叵测之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何蜀在供职糊口之余，以搜集文革史料，研究文革历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成果累累。其著述文章，纵不容于时，但必将久传于世。

北京 枯柳树

2008-7-6

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书评与序跋】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后记](#)

本书的写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要写好重庆武斗，一要有资料，二要有对亲历者的采访。而对于我来说，这两方面都很欠缺。尽管重庆是我的家乡，自出生后我就一直生活在重庆，但恰恰在重庆文革大武斗期间我却基本上在外地，对家乡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多系间接了解而少有亲历实感。家里搜集的一些小报曾由我父亲（他喜欢做事有条理）精心装订成册，已经颇为可观，但是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期间，街道居民委员会三令五申，严厉告诫各家各户交出文革“派性宣传品”，否则今后查到就要严办云云，我的外婆成天提心吊胆，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再保存那些堆在床下可能惹祸的资料了。那时百姓家里居住面积狭小，根本无地方可以收藏，加上我父亲又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又被批斗、游街，那时正在工作单位上监督劳动，经不起任何新的打击。因此我只好忍痛把那一册册小报拆开，选取极少几份内容最重要的留下，其余的全部陆续在烧火煮饭时化成了灰烬。

文革结束以后，我又重新开始搜集资料，总算陆续又积累了一些。到90年代中期，我的写作兴趣已经从文学转向了历史，这时想的虽然还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但已经不再是想写虚构的小说而是想写真实的历史，不是想歌颂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而是想反思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了。1994年，我开始学用电脑，学习打字时打下的第一行字就是“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我把录入重庆文革大事记当作打字练习，开始了新的写作。

写作有关重庆大武斗的历史，还得益于许多当年当事人和知情者的支持帮助。其中，特别是当年重庆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年长我十岁的李木森。在我帮他整理回忆录前后，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对文革和对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不完全一致，但我们相互能坦诚相待。通过他，我陆续结识了当年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一些风云人物，并同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友谊。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亲身经历，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使我对那场震惊世人的大武斗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和感受。

此外，同样对重庆大武斗进行了关注和研究的一些重庆朋友，如文革小

报收藏家张瑞华先生，最早提议写作重庆武斗纪实作品却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的于琦先生，最早写作并出版了有关重庆文革的长篇回忆录的周孜仁先生，最早研究重庆沙坪公园武斗死难者墓群的陈晓文先生，曾亲历重庆武斗并对一些武斗事件展开了认真调查研究的韩平藻先生，曾亲历重庆武斗并较早写出了有关纪实作品的李正权先生，对重庆武斗墓群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大量追踪采访的曾钟先生，因母亲在武斗中无辜遇难而长期成为沙坪公园文革墓群义务宣讲员的席庆生先生，远在异国他乡却继续关注研究重庆武斗的人类学学者张跃宏先生等，都以他们搜集的资料和他们不同角度的著述及研究成果、亲历见闻等给我的写作无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当然，由于官方收藏的历史档案仍不解密（重庆档案馆的文革时期档案要有中共市委常委会的批示才能有限地查阅），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仍然难于查清。这只有等待来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有些人经常用来教训东邻的话，然而对自己的一些“前事”却似乎希望人们能尽快遗忘。但愿此书能为拒绝遗忘的人们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

2010 年春节于重庆风江阁

【书评与序跋】

值得一读的《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

童 话

文革研究在国内尽管倍受压制，但夹缝中还是钻出过一些颇有分量的书或文章。本文介绍的文章就来自正式出版物，是《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中的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第二节，题为“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

《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是“北京教育丛书”中的一本，其丛书编辑委员会的首席顾问是徐惟成，主编徐锡安，编委人数多达 64 人。这一册的主编是李晨，副主编萧沅、刘秀莹。该书为正式出版物，其编者均为体制内干部、

学者，政界、教育界知名人士，他们在编撰过程中有机会参考官方的档案和文献。

“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一文分“红卫兵的起源”和“红卫兵运动的具体活动”两个小题。先介绍第一小题“红卫兵的起源”。这一题下的字数不多，不妨将全文录出如下：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几个学生商议怎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取名红卫兵。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宣称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当时北京的中学教师正被工作组组织起来集中学习，交代自己的问题，学生无人管理，已经组织起来的红卫兵便为所欲为。工作组认定这类红卫兵组织干扰教师集训，属于非法的学生组织，予以打击压制。但当工作组撤走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大字报首先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8月1日，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主席这封信。于是北京的大、中、小学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逐渐影响全国，以后机关、团体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第251—252页）

第二小题是“红卫兵运动的具体活动”。这一题下把红卫兵运动的具体活动归纳为下列六个方面：“掀起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破四旧”、“摧残人身人格，草菅人命”、“宣扬反动的血统论，使之横行一时”、“严重破坏校舍、设备、图书”、

“进行大串联”。

该书对红卫兵在这六个方面的活动作了具体介绍。

1、在“掀起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一小节中，编撰者采用的主要事实之一即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献袖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主席的左臂上，从此红卫兵大肆宣称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第253页)

宋彬彬的名字被×××代替，让读者感觉到编撰者的态度。他们能考虑“八一八”献袖章对宋彬彬个人名声有负面影响，故以×××代替实名的处理，但他们不能对“八一八”献袖章事件避而不谈。这一事件对掀起崇拜毛泽东狂潮和造成平民流血的祸乱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一文把它作为红卫兵运动具体活动的首要事例。

2、在“破四旧”一小节中报告：最先冲上北京街头横扫四旧的是北京××中学等三所中学的红卫兵，最先砸掉的是北京前门大街的全聚德，在北京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红卫兵运动破坏了4922处。到1966年9月底抄家的户数是36200多户。“红卫兵的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制造了极大的红色恐怖，却得到了宣传舆论的大力支持。在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红卫兵致敬！》中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第253—254)

3、在“摧残人身人格，草菅人命”一小节中，列出了1966年8月19日(“八一八”次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的人员名单，他们是“张文松，李晨，韩作黎，孙国梁，汪家谬，候维城，杨梅荣，杨滨，汪一静，温寒江，华锦，李雁书，武继广等同志”。红卫兵对他们“大打出手”。文章指出“在短短的几十天里，(教育工作者)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

计其数。”并且列出了教育界部分领导干部的死亡名单：“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北京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女三中党支部书记沙坪，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女十五中党支部书记梁光琪，五十二中副校长易光谔，白纸坊中学党支部书记张冰洁，房山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喆，史家胡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赵香衡，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拈花小学副校长刘竞珍等”。指出“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页)

在这里，编撰者把这些人的死亡均定性为红卫兵运动的牺牲品，此说法值得注意。

4、在“宣扬反动的血统论，使之横行一时”一小节中，指出了血统论与红卫兵运动相关联。“此论一出笼，学校里便掀起一股逆流，师生均需自报出身，按出身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第256页)指出这点，使当年的社会场景再度浮现。

5、在“严重破坏校舍、设备、图书”一小节中，不仅记录了校舍、设备、图书在红卫兵运动时期受到的严重破坏，而且提到一种“焚书烤儒”的刑罚——“有的学校焚烧图书资料时，让校长、教师跪在周围，名曰“焚书烤儒”。(第256页)

6、在“进行大串联”一小节中，文章指出大串联是1966年8月18日到1966年11月1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的产物，“到外地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多以革命代表自居，每到一处便颐使气指，乱批乱斗，弄得鸡犬不宁。”(第256页)编撰者的记述与评论体现出对史实的准确把握。

总之，《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全书和我重点介绍的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第二节“北京中小学的红卫兵运动”很值得一读。

2010-5-30

【文摘】

按：杨树达(1885—1956)，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学家，著有《词诠》等

传世经典。本文作者是其孙。本文中的祖母，即杨树达之妻张家祓，曾任教于长沙湖南女子师范，向警予、蔡畅等都是她的学生。

祖母和她的左、右派儿子们

杨逢彬

杨树谷、杨树达兄弟的儿子共九人（大排行）；其中二、五、六、七、八、九是杨树达先生的儿子；而七、八、九以及他们的两个姐姐是我祖母张家祓所生。九人中，杨伯峻（德崇）先生为老大，同辈称之为寿哥，我称之为寿伯伯；我父亲德嘉为老九，哥哥姐姐和学生称之为九弟。七伯父由于是右派，八伯父由于有肺病，都结婚甚晚，所以我得以成为祖母的长孙。当年，祖父的追悼会刚开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1959 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就召集祖父儿子中的四个党员文玄（德鑫，六）、德豫（七）、德庆（八）、德嘉谈二姑父的事情：“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就不处理了。”其实二姑父是个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学者，抗战时，曾经追求过他的某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仅此而已。

丧事办完，紧接着开家庭会商量如何处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一边倒的意见是，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会上，抗战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大姑德娴怯生生地提出想保留一套《李太白全集》作纪念，解放前夕担任地下党清华中学书记的八伯马上正色操着京片子道：“我们喝劳动人民的血已经够多的了！”大姑于是噤口不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亲见八伯为此向大姑道歉。父亲的兄弟姐妹因为出生成长在北京，相互间都说一口京片子；我母亲是北京人，父母之间也说北京话。

祖母按照旧社会的规矩，认为人都死了，还住单位的公房似不合理，就加紧物色合适的宅子。这样，我出生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杨家便举家从岳麓山腰的至善村，迁到长沙市北区兴汉门的湘春中路 36 号——安庄。这是用祖父毕生积蓄的一半——六千元人民币买下的，这宅子占地约四亩，是有着前、后院和菜园的洋房；浓荫蔽日蝉高鸣，葡萄架和桑树上硕果累累，凉亭依偎在池塘边。这在经

过文夕大火之后的长沙，已经是座“豪宅”了！一位抄家无数的红卫兵后来说，这是当时长沙最大的三座宅子之一，其余两座是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住宅以及先是何键后是程潜的蓉园，蓉园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住所。

洋房两层，坐北朝南，大门左右各有几间平房。厨房在后院靠西，厕所在后院靠东，分男女厕，都是蹲式抽水马桶。住的人除祖母外，就是我父母和我，尚未结婚的八伯，已经和上海大伯（大排行老二）离婚的大伯母王舜芝带着祖父的长孙逢甲，大姑家，二姑家，保姆何月英。还有空房——即原有的图书室、儿童活动室、储藏室等。刚收拾停当，居委会出面了。他们毋庸置疑地说，很多人没房子住，你们却有空余，因此必须出租；租金每户每月为一元。这样，一下子又搬进来几户。住在大门左右平房的是小崔、小李，住二楼的有一户汉口人、一户上海人。小崔、小李都是青年工人的家眷，为人极和善，见到祖母就毕恭毕敬称呼“杨老太太”，老家捎来的土特产也必定送给老太太尝尝。小崔的儿子叫“小狗子”，比我小，成天跟在我后面。我读大学时他妈和他还来看过我，请我到他家吃饭。楼上的两户经常干仗，每次争吵，楼下基本上只能听到汉口女人的大喉咙；不用说，她总是胜利者。她有两女一儿，儿子最小，唤作“苕货”，又白又胖，成天在院中裸奔。为裸奔配乐的，就是他妈妈拖长声音的大叫：“苕货！苕货！”这一奇妙音乐每天在花园洋房上空回荡，至今还萦回在我脑际。

洋房原本是一位刘姓资本家的，大约估计迟早不保，于是趁早卖掉，远走香港。据说改革开放后，他成了化工部顾问。他开的是一家安装公司，所以这个宅子取名“安庄”。洋房正面有一排高高的梧桐树，刘先生在其中一棵刻上：“别了，安庄！”1964年元月一日，一年级的我在这四个字下面刻上了“元旦”。后花园西边有小门与安装公司的铁工厂相通，东边与木工厂相通。

不知什么时候，渐渐感到吃不饱饭了。肚子一饿，就喜欢往厨房跑，发现蒸饭的锅变得奇大——先在锅里放上水，然后放进许多装着米和水的搪瓷杯；吃饭时，每人一杯半干半稀的饭。我那一杯很快吃完了，祖母就从她杯中赶出鸭蛋大的饭给我；牛奶订不到了，她便在湘春街一家奶羊场给我订羊奶。当地人称这一时期为“过苦日子”，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一天，祖母花一百块钱从某人手里买下一大钵猪油。做饭时，保姆在厨房大叫，原来那是一钵石膏！我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听肉泥罐头，加上许多白菜，

让我妈妈包饺子，那一顿至今让我齿颊留香。

1957年，老大伯峻、老五德骧、老七德豫和我父亲都成了右派。我父亲在新湖南报社工作，省委顾虑到祖父与伟大领袖的关系，改为留党察看，降工资三级。而在北京工作的老大、老五以及在广州工作的老七就没有这份运气了。两个姑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终究是“严肃处理”了。

祖母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毕竟是家庭妇女，没经过“洗澡”，不懂得“划清界限”，还经常带我去看她的亲家周焱驰。周焱驰生活虽然异常清贫，但非常整洁，一尘不染；也丝毫不减礼性，除了泡茶，还要摆上两碟点心。祖母显然也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严肃性，每次走访后，都嘱咐我不要说；她甚至对七伯父发表错误的政治见解，说治理国家还是国民党强些云云。

有一段祖母恹恹然卧病在床，这时一位北京中国书店的人来家收购祖父的遗稿。祖母见来人持有祖父老朋友马宗霍的推荐函，就让他自己到楼上储藏室去找。那人将收集到的东西装满一担，列了一纸清单，请祖母过目签字；祖母未暇细看，就签了字。后来，其中的《积微居日记》四十九册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买走，另一种重要遗稿被中央民院图书馆买走，而凝结了祖父毕生心血的《文字形义学》定稿则不知所终了。杨伯峻先生知道此事后，曾试图挽回。那人拿出祖母签字的清单为证，伯峻先生无可奈何，多年后还埋怨婶婶。《积微居日记》尚遗留两册在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使这份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成为完璧，杨家无偿将它们捐给了中科院图书馆，只是索要了这两册的复印件。近年来，不下七八家出版社对我说很想出版《积微居日记》，最后都未能如愿。我曾建议有的出版社不妨先将这两册（第46册：1948年底-1949年9月；第50册：1952年底-1954年三月）付梓，以为引玉之砖。

祖母用钱是大手大脚的，儿辈所寄赡养费每月约七十元，似乎总是不够。人们常说她老有福气，每当经济上紧张时，就有一笔稿费来。稿费一般是祖父的，如《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也有七伯父的，如《朗费罗诗选》。“苦日子”过后，祖母又恢复了上街购物的习惯，我都有幸陪同。如路途稍远，必定乘三轮车，风雨无阻。去得最多的是“沙利文”食品店，买新出炉的面包和蛋糕。这时，必定给我买一包牛肉干。各食品店的营业员全都笑脸相迎，服务周到。祖母表示感谢时，他们总是说：“您是毛主席的师母，这样做是应该的。”

杨家又经常高朋满座了，尤其是过年期间，来看望祖母的人络绎不绝，一般都是祖父的学生、生前友好和他们的晚辈。有位个头不高白白胖胖毛线帽上有两个小球的柳伯妈笑声爽朗，极为健谈。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伯祖父、祖父一生至交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李淑一。我还记得她挽祖父的下联：“大师捐馆舍，相见何慳一面缘。”是说1956年春节她正要来拜年，祖父就过世了。据说她的健谈救了她。1957年，她供职的长沙十中已内定她为右派，只等宣布了。周日，师范学院几位学生来看她，她便谈到毛主席最近寄给她的那首《蝶恋花》。几位学生回去后，马上就把这首词发表了，一时十分耸动。十中党支部便悄悄撤下了李的材料，这事直到“文革”档案外泄才“东窗事发”。她老真是“福从口出”啊！1980年暑假我到北京，还在三里河她家见过她老一面。

每到春秋佳日，我们还一大家子同游岳麓山。先乘轮渡到水陆洲，过了浮桥到濠湾市，一行人迤迤往二里半而来。来到师范学院传达室，守传达室的李惠慈是祖母的表妹夫。土改时，祖母的表妹沈立君从宁乡逃到长沙杨家，住了下来，祖父忧之：万一自己不在了，表妹将何所托乎？何况姑娘年龄不等人。于是祖父找到了出身贫农、老实忠厚的李惠慈……195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请祖父取名。考虑到沈立君多病，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便取为“定萱”——萱草代表母亲。沈立君多病，李惠慈忙里忙外，虽然工资不高，却把个家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祖父坟墓上的柏树，也是李惠慈种的。李定萱1977年考入师院外语系，后来到美国去了。他虽是我的长辈，小时候却是一起玩的。

闲言少叙。在李家稍坐，便到至善村——师院教师大多住此。祖母人缘极好，各家都争着抢着请她老去坐坐，杨家其它人则去给祖父上坟——山高路陡，祖母有心无力。坟上完后，即从至善村斜插到爱晚亭，然后白鹤泉、麓山寺，直到主峰顶上的云麓宫。大家坐下，吃热包子，喝茶。那时购买力低下，游山的人极少。包子吃完，年轻人即去看飞来石，谒黄兴墓，中老年人则陪着祖母在云麓宫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极目远眺：岳麓林海之东，湘江宛如一条碧绿的腰带，迤迤北上，再看过去就是市区的闾阎十万了。1955年6月20日，祖父与毛泽东、周世钊、程潜等人同游岳麓山，毛泽东有《七律》记游：“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周世钊也有句云：“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

长沙百万家。”可见云麓宫确实是个观景的好去处。

“苦日子”结束到“文革”开始那几年，杨家还比较平静。安庄已年久失修，洋房外墙一层层地脱落，露出红砖；花园长满了杂草和蓖麻，成了黄蜂的领地，我就因为擅自入侵被蜇了几次。保姆在后花园种了好些菜，用有机肥浇灌，我们吃上了绿色植物。一人合抱的大桑树上结满了紫红的桑椹，只有汉口女人的大女儿能爬上去，一会她就摘下满满一篮，也分给杨家一点点。小崔、小李家就在葡萄藤下，她们的丈夫摘下葡萄后，总是全部送给杨老太太，自己只肯拿一点点。漫长炎热的溽暑，蝉娘子单调的叫声如雷鸣一般。

1965年春，斜对面长沙北区区委看中了安庄，便找八伯和父亲两位党员商量，要他俩听党的话：“我们给你们另外找了一处院子，你们搬走后，还会有所补偿的。”很快，杨家举家迁往不远处蔡锷北路上学宫街一条巷十四号，恰好在华昌百货公司后门处。补偿款为数百元。

这处宅子总面积约相当安庄的五分之一，也有前后院，不过很小。洋房一层，后院有平房几间，可充作厨房，也可住人。因为面积小了许多不够住，几年后大伯妈王舜芝只好搬走了。那院中还住着凌户籍一家，他就是本辖区的民警。厕所在后院角落，就是一个坑上安个木头架子，夏天气味难闻。最麻烦的是没有自来水，要从两百米外的水站买水。后院和连接前后院的走廊各有一株葡萄藤，浓荫蔽日。前院栽有石榴、夹竹桃、腊梅和一株巨大的广玉兰；我曾在浙北南浔见到两株供人参观的大广玉兰，也没那棵大。

这宅子的前门在前院，出门即是上学宫街一条巷，后门对着华昌百货店后门。不知何故，杨家一直都是“走后门”，来往最多的就是紧挨着的成家了。“成”姓长沙话读“常”，户主人称“常胖子”，是一家大饭店的经理兼主厨，他最得意的经历是为周总理做饭；他太太人称常娱驰，经常到杨家串门，顺便上厕所——公厕要走几百米。

祸福相倚。有人分析说，幸亏杨家搬走了，否则“文革”时期该豪宅目标过大，似乎难以避免被冲击的命运。然乎？否乎？但毕竟这是“出于乔木，迁于幽谷”，可是祖母依然那样气定神闲，未见丝毫牢骚与怨气；只是不久后一次与故人的偶遇，使她老陷入深深的不安中。就在学宫街上，她遇见了曾在湖南大学任教的董每戡教授。董对她说，这宅子解放前是一国民党军师长的私宅，董家从广

州迁往长沙后，一直住在这里；前不久北区委才把他家弄到学宫街上两间旧瓦房内……祖母顿时觉得是自己亏欠了董教授。董教授是浙江永嘉人，1953 年从湖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教书。他怎么又回到长沙来了呢？“文革”后期，由于姑父自杀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大姑，在街道图书室任管理员，和董夫人胡大姐——一位著名湘剧演员——成为好朋友。据胡大姐说，反右后期，董教授即将成为右派，由于他早年曾为党做过秘密工作而遭国民党通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陶铸想要保他，前提是要作深刻检讨。但董教授认为自己没错，坚持不写。他对胡大姐说，不让我当教授了，大不了卖文为生嘛！结果夫妻双双成为右派，投出去的稿子也如泥牛入海。眼看坐吃山空，胡大姐提议不如回到自己的故乡长沙，好靠亲戚朋友照应……“文革”时，我们那街道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每当宣读毛主席最新指示，总让董先生等几人弯腰弓背站在台上；平时，也经常看到他在扫街。

八伯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天他从农村火热的阶级斗争前线回来，看到祖母房中挂着四幅泛黄的古代花鸟工笔绢画，觉得格格不入，马上愤怒地扯下，点火就烧；祖母抢救下其中一幅。这几幅画是 1956 年我外公为祝贺祖母乔迁之喜，从北京寄来的；他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宫中太监那儿购得。余下那幅 1978 年经徐邦达先生鉴定为明初古画，因没有题款，并不值钱。

很快，“史无前例”开始了。街上的喧天锣鼓，居然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祖母也吸引上街了。看着满街的毛主席像，听着洋洋乎盈耳的“万岁”声，祖母脱口而出一句：“毛胖子如今真时兴啊！”这话可把我吓得不轻，拖着她就往回走。她却不紧不慢地说：“不要紧，他还欠我一床被子没还呢！”原来，祖母 1906 年以第一名考入周南师范第一届，1911 年底以第一名毕业，校长朱剑凡亲笔书写了该校“第一号”毕业证书；旋留校任教。祖母在周南的班主任始终是徐特立先生。后徐特立办了所幼师性质的“稻田师范”，请祖母出任附属幼稚园主事；同时她在第一师范任课，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经常去稻田找徐特立谈天，往往通宵达旦。有天晚上，毛泽东持徐写的字条到祖母处借了一床被子，后不知何故没有归还。祖父与徐特立是老朋友，“五四”前后，他俩与陈润霖、朱剑凡共同发起了湖南教师的进步团体“健学会”，倡导新文化运动。那时祖父也经常去稻田找徐特立，祖母也见过他，但没料到几年后竟然会在北京结为连理。1955 年祖父母在北京去看望徐特立，徐高兴地说，你们两位，一个是我的朋友，

一个是我的学生，竟然走到了一起，太好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紧接着的许多事让人啼笑皆非。1966 年天气渐热，祖母上街买了一瓶花露水。八伯回家见到这种资产阶级的货色，怒不可遏，就把它全洒在粪坑里。以后的几十天，后院里弥漫着一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味。紧接着就是抄家的危险降临，我已在《丹书铁券》中叙述过了，可谓有惊无险；否则无书可读，我恐怕也无机缘写作此文了。

一天，我和祖母各自拿着一本小人书在看，来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都是祖父的学生，男的叫李祐，是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女的叫罗琪，中文系教师。他们面色凝重，说了几句寒暄的话，留下两包点心就告辞了。他们走后，祖母拿点心给我吃。过了两天，祖母对我说，那天送点心的两个人自杀了！祖母介绍说，李祐家是祁阳大户，姐姐叫李祁，诗词写得极好，一生未婚，后来到美国去了。又说祖父死时，罗琪极为伤心，边恸哭边说有年没钱交学费，正发愁要退学时，总务主任告诉她，学费遇夫先生已经代交了。祖母还说，是李祐先上吊死，而平时忙里忙外都是李祐，罗琪顿时感到天都塌了，也就步了丈夫后尘。关于此事，湖南师大退休俄语教授李蟠先生写有《一根绳子，两条人命》。

很快“武斗”就开始了。出门二三十米来到街上，到处可见腰间挂着手枪的人。一天，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出去一看，发现杨家后门处枪走火，一颗子弹伤了三个人——穿过两人身，又从常胖子小女儿耳廓边擦过去。

我父亲 1957 年任新湖南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因办报理念与省委不同而被定为右派。他认为应该多以党的思想政策教育农民，而省委发来的稿件多是冗长的诸如定额包工和双季稻栽培技术的文章，读之使人昏昏欲睡。这时对照“文革”精神，觉得自己当年并没错。恰好有几位在衡阳的编辑部右派朋友来串门，鼓动他“翻案”。开始父亲并不想参加，他想这些人要是弄成了，自己也有份；弄不成，自己是党员，每月工资有八十多元，也算不错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觉得这样想想都很可鄙！于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毅然决然参加了。他当过领导，组织能力较强，后来居然成了“翻案”集团的头头之一。那些朋友来找他时，我在衡阳；后来到长沙“策划于密室”时，我又在长沙。只见我二姑的那间房里，长辈们来来往往，大声讨论，热闹极了。

一段时间后，我又到了衡阳，那天正到母亲单位地区森工局食堂吃饭，发现

吃饭的人比平时多多了，大概各县局的人都来了。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大伙是刚从“广场”——衡阳最大的群众集会场所兼体育场——开会回来，与会者多达十万，批斗六个人。我聚精会神听着。他们先说到五个人，都是地区和市里的大干部，如陈祥聚、张维新、杨兴洲、岳剑飞等，然后他们说：“杨德嘉真是狗胆包天，还敢组织右派翻案！”我一听就懵了！吃了几口就走。刚回家，还没来得及禀告母亲，就听她说：“你今晚到长沙去吧！”

这时，长沙也已风声鹤唳，杨家一向低调，此时更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原街道居委会的陈主任、穆瞎子等一见到杨家的人，一张脸马上拉得老长，还经常深更半夜查户口，“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户口在衡阳，家里只好把我送到保姆何月英的老家——宁乡花明楼戚家山她妹妹家放了半年牛，还参加了春耕和双抢。

有道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又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地下党书记出身的八伯似乎熟门熟路；不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两场“自卫反击战”就是在此情况下发动的。一天，杨宅前院的围墙突然被推倒了，紧挨围墙的一大丛夹竹桃也被砍掉，紧接着，隔壁开始了建房施工，他家墙基向杨宅前院推进了一米。八伯忙去交涉，一个黑大汉跳将出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如今是我们工胖子的天下……”我也不知道这之后八伯做了什么，反正几天后黑大汉过来赔礼道歉了，已经砌到一米高的墙也拆掉缩回去了，只是夹竹桃没有了，未免可惜。

凌户籍白住着杨家的房子，杨家并不敢奢望他会搬走，和他老婆孩子相处也算融洽。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凌户籍开始四处张罗，要赶走杨家，好独享这一宅院。他找到原北区房地局娄某，共同炮制了长达九十多页的材料，力证杨家都是些牛鬼蛇神，不配住这么高级的“甲类住房”。他们将这些材料寄给杨家所有成员的单位，如我表哥所在的化工机械厂就据此将他整了一回。这可真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了！八伯于是写了一份材料，附以毛泽东写给祖父的三封信的照片，请周世钊交了上去。当时湖南省革委会主任为华国锋，省军区司令为杨大易。信转到了杨大易那里，杨派省群工组负责人刘国强处理此事，刘派来了两人，其中一人曾为群众组织“高司”的负责人。来人态度恳切，问杨家有何困难？有何要求？就这样，凌户籍被迁走，并调到另一派出所去了；陈主任、穆瞎子等拉

长的脸又缩了回来，春节时还提着酒来嘘寒问暖。

八伯认识的人极多。如周世钊，从 1969 年直到周 1978 年（注：应为 1976 年）去世，来往都极其密切。周是民主人士，“文革”前当过副省长。一些人以为他如今成了走资派、死老虎而时不时踩上几脚。他们哪里知道，周是毛泽东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五四”运动前后毛在长沙活动时，一有困难就到周那里又吃又住，如同亲兄弟一般。赶走凌户籍之前，一次八伯联系周某日到他任教的长沙一中讲毛主席青少年时的故事，恰好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卜占亚的儿子在该校念书，这事就让卜知道了。卜大发雷霆，说怎么还让走资派出来放毒？不久，毛接周到北京叙旧，问卜表现如何？周如实说了。那天凌晨毛周会谈后几小时，即上午十点，卜还给长沙湘江大桥剪彩；不久，就到桂林某步兵学校当政委去了。周返湘后，来探望祖母，说毛曾问起杨家近况，周说他美言了几句。这事对八伯鼓舞很大，后来对黑大汉凌户籍之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大概与此有关。

长沙杨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算是缓过一口气了；但是在衡阳，我父亲这一房的日子可是很不好过。从 1968 年 9 月 13 日“广场”十万人批斗开始，我父亲就身陷囹圄了。坐大牢八个多月后，转移到三塘学习班；这里关了一年多，又转到铁路边的地区卫生防疫站。我是 1970 年春节后到的衡阳，三塘去过几次。防疫站因为离家近，便经常去送东西，但必须经过门房检查，寄来的信件也须他们先看。其中有封信，我事后读过，一猜就是八伯起草让祖母誊抄寄出的。信中煞有介事地斥责父亲“忘了本”，说什么“你忘了吗？在辰溪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戴着斗笠在厨房做饭……”当然，这些话是写给检查者看的。祖父虽然抗战前还算宽裕，但属于“自由职业”，和中农相等，不是“剥削阶级”。给父亲罗织罪状的人当然明白这点，他们闪烁其辞地说什么杨某某“出身豪华家庭，兄弟姐妹都在海外为美蒋效力”。“戴着斗笠在厨房做饭”，确是抗战后期教授家庭的真实写照，而“兄弟姐妹都在海外为美蒋效力”，则完全是杜撰，捕风捉影都谈不上。

父亲直到 1972 年才“解放”。他写有《遭遇“革命”——我和我的家人》，网上可以看到。

那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他们的名字从报刊书籍上彻底消失，他们的著作在书店和图书馆里无踪无影，因此，一旦某人的名字出现在

报端，他的家人和亲戚便高兴极了。如果某人的著作居然解禁，那就更是喜事一桩。倘若承蒙伟大领袖眷顾，问起某人或某人家属的情况，那简直就像过节了。因为如果出现上述情形，日子必定会好过一些，甚至大为改善。“文革”中，家里还发生过几件“高兴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书籍解禁。解禁书目为白封皮，十六开，大约两毫米厚，其中有祖父的《词论》。这事着实让家人兴奋了几天。

“文革”后期，章士钊衔最高当局之命，赴香港对台湾蒋氏父子实行统战，结果一病不起。因章与毛泽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先还资助过毛三千大洋，又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他的追悼会规格很高，报道版面很大。那几天，我在长沙听见长辈纷纷议论，《人民日报》报道章的“生前友好”名单中赫然出现了“杨伯峻”，他们都很高兴，这说明杨伯峻已经“解放”了。

“四人帮”倒台前后，美籍华人梁容若先生回国，许多高官接见，引起相当重视。一天，《参考消息》花了几乎整整一个版面登了梁先生的《从鲁迅先生读小说史》。他说大约在1924年时，还是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的他，受系主任杨遇夫先生之托，到鲁迅先生家请他填表。先生本不愿填，但看到“杨主任”工楷代填的各项，才收下表格，并与梁先生聊天。从此，梁开始从鲁迅先生读小说史云云。这篇文章里，祖父的名字不单出现而已，还有具体情节，这在当时分外难得，亲戚们都找到这天的《参考消息》，珍藏起来，至今我父亲处还有一份。

1975年，杨宅因为葡萄藤长年累月在瓦上爬，引起漏雨。八伯那时听祖父好友、《三个火枪手》的译者李青崖先生的女儿李敏求说她父亲的房产经周恩来批示落实了政策（李先生在法国时与周熟识），就通过海军政委苏振华的女儿将一封信交到了总理那儿。总理作了批示后转交华国锋办理。很快就有人来修房：砍掉了葡萄藤，修整了屋顶，将后院铺上了水泥，并把后院的小门改成大门；安装了自来水管，从此不用再到水站挑水了。从这时起，省委统战部每月发给祖母四十元生活补助，直至她老去世。八伯弄到了一套煤气灶和煤气罐，据说全省只有四百套。祖母吃一种香港买来的胶囊补药，精神好了很多。

到1979年中医学院放寒假，刚好读了一年。我已买好去衡阳的车票，行前去看祖母。时值隆冬，又是阴天，朝前院的窗子敞开着，炭盆里只剩下一点火星，我冷得瑟瑟发抖，把手伸向炭盆。祖母问：“你冷吗？”我反问：“您不冷吗？”

“不冷！”一丝不祥之感掠过我心头：“难道这就是所谓‘虚阳外越’吗？这对高龄老人可不是好征兆啊！”马上我又安慰自己，前不久我的同学，出生中医世家的黄一九还说她老脉象平和呢！何况我才刚刚学医，也不太自信，但心中总想着这件事。刚过完年，在衡阳的我听见门外邮递员大叫：“杨德嘉接电报！”心里大叫不好！一会，看见母亲哭着进来了。当时就去买火车票，我和爸爸赶往长沙，只见祖母躺在她房间的担架上，面容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这天早晨，住在隔壁的大姑听见祖母房中一响，好像重物倒地的声音，敲门不开，搬个椅子到前院垫脚，从窗户看见祖母倒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块蛋糕……当晚，父亲决定和我就睡在祖母床上，大家都来劝止。父亲说：“她是我妈妈，难道会害我吗？”两人遂安然入睡。第二天办丧事，常胖子自告奋勇来帮忙。办豆腐席那天，他在后院架起一口大锅，炒起菜来。到底是给周总理做菜的大厨，自然不同凡响，真个是色香味俱全。这时，有一清癯瘦小的老者提着两包点心来给祖母拜年，大姑介绍说，他叫范自学，住麻园岭，是祖父的私淑生。祖父在世时，他曾来请教过几次的，以后年年都来给祖母拜年。饭前在堂屋开追悼会，何申甫（泽翰）先生宣读了自己撰写的悼词，祖父在长沙的学生到场的，还有易祖洛、易仁菱、廖海廷等。这时正值右派改正，牛鬼蛇神纷纷出笼。那天来参加追悼会的有沈立人、彭艳姣等。沈是抗战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某抗敌演出队的队长。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以这些演出队员为题材的。至于彭，我开始以为是位女士。彭写的悼文挂在堂屋，写得像散文诗一样。第一句是“杨师母，你是中国妇女的楷模”，署名“彭艳姣”。大姑告诉我，在街道工厂做事的彭是抗战时成名的诗人，后任湖南大学、湖南师院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成为“胡风分子”。他本姓陈，笔名“彭燕郊”。彭五十年代与祖父时相过从。我在网上看到，彭曾对人谈及祖父在1955年6月20日与毛泽东、程潜、周世钊等人同游岳麓山时，毛讲到反胡风问题。我所听到的，与彭所说小有不同。毛说：“最近出了个胡风集团。”杨问：“他们做了些什么？”毛答：“反对我。”杨问：“他们有多少人呢？”毛答：“几百人。”杨问：“您准备如何处理他们呢？”毛未作声，右手掌心朝上从右往左一挥。这事是我大姑杨德娴和祖父的学生廖海廷曾在不同时间、地点告诉我，他们说得可是一模一样。

二姑父死于1978年初，没等到平反昭雪；祖母死于1979年初，那时五伯、

七伯和我父亲等都已“改正”，总算没有抱憾而去。

1984 年，我和表哥杨立将祖母的骨灰埋葬在祖父墓侧，湖南师大请人在祖父墓碑“杨树达教授之墓”旁刻下“夫人张家祓一九八四年附葬”，二十八年之后，老两口在惯居的岳麓山来了个“小团圆”。

节录自作者《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原载《东方早报》，选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资料】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 年 1 月 5 日成立)

主任——

程世清，50 岁，河南新县人，江西省军区政委

副主任——

杨栋梁，江西省军区司令员

黄 先，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现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于厚德，陆军第 121 师政委

万里浪，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人，江西省“大联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

常委——

文道宏，江西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鲁 鸣，空军 24 师政委

罗元祈，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陈昌奉，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刘瑞森，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郭光洲，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

丁士采，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政委

许洪云，陆军第 76 师政委

李 鹏，陆军第 60 师副师长

于德馨，原中共南昌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南昌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

龙标桂，原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监委副书记

刘剑秋，原江西省经委副主任

王萱春，原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

蔡松林，江西造纸厂工人，“大联筹”负责人，工人指挥部负责人

涂 烈，江西拖拉机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大联筹”负责人

汪桂荣，铁路工人，“大联筹”负责人

吴才枋，农民，兴国县长岗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全生，大学生，“大联筹”负责人

周升炬，大学生，“大联筹”“大中红司”负责人

蔡方根，大学生，“大联筹”“大中红司”负责人

张行阳，中学生，中学红卫兵负责人

本名单经余汝信先生帮忙校订补正，谨致谢忱。

【编读往来】

一、林雪来信

你们的杂志办得越来越好了。尤其是这 55 期，每一篇都堪称精品，都是高屋建瓴。两篇故事文笔也都很精彩，简直就是好作品，哪个杂志发表了，肯定都能够卖好。

二、小庄来信

本期《记忆》史云文中有一句话：毛并没有把接班人的最高权力交给江青或者代表江青的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而是交给了中间派华国锋，这也使他带有革命的神圣，而不是家族斗争的庸俗。——那是因为老毛没有儿子！要是有的话，

我们今天应该和北韩一样。

毛是个“封建”到了极点的政治人物，他一生的“革命”举动都是在利用革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像马列理论在中国永远都是个幌子一样。如果把文革说成是老毛的最后革命，那是他又在利用革命的手段来达到他把握最高权力，并期望永远把持最高权力的目的。如果把毛塑造成个革命者，就很难从中华文化传统方面来深刻认识他的本来面目，毕竟他是个地道的，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浸泡出来的，典型的红色帝王。相信研究文革的学者中，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很有限，所以总是习惯用“外来的方式”来研究毛，而忽略了用我们传统文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毛从井冈山开始，所使用的“革命”手段，都是带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痕迹。因为他面对的都是中国人，即便是喝过洋墨水的，也都是中国人，所以，以他丰富的“文化底蕴”，加上马列外衣，在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中，使他总是能够化险为夷，甚至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再加上整个国际环境的“配合”，他只用了 20 年就坐北朝南了。

“思痛文学”一文中提到的羞辱与认罪，使我想起来禅宗百丈禅师的丛林制度：中共惯用的那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人方式即来源于此。只不过使用的目的和方式有所不同。这样的方法对付国人很好用，特别是对付那些心存善良的老实人。这样的事用“革命”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的。

这期中，你们给出了思痛文学书目，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你们真了不起，功夫到家！

[三、平衡来信·编辑部答复](#)

《记忆》杂志从社会各角度忆记“十年浩劫”之真实史料，堪称当代《史记》。

本人拟将其合订本分三册装订，并愿意赠送《记忆》杂志的粉丝们。到目前为止，第一册（第1至20期）已装订完毕；第二册（第21至40期）因缺第34、37至39期暂待装订；第三批（41至60期）已有第43、52至54期，尚缺第41、42、44至51期，且第55至60期未出刊，须到年底方能组装。特此征求《记忆》杂志的意见。

平衡先生 钧鉴：

承蒙厚爱，不胜欣然。我们相信，此举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您的自费付出。因此，我们要提醒您：请考虑到您的承受能力。因为您要装订成册的是三百万字的《记忆》，除了打印费、复印费、装订费之外，还有一个给“粉丝们”邮寄的费用。万一有一百个“粉丝们”向您索取，您能承受得了吗？

《记忆》编辑部

2010-8-24

四、陈寿仁来信·编辑部答复

《记忆》里有许多关于文革的文章，如有人想看，能转发给他吗？如果他看中了要推荐给某杂志等刊物，可以吗？是否侵权？

陈寿仁老师 雅鉴：

关于您提到的问题，涉及到《记忆》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国人关心文革，研究文革，并欢迎大家赐稿。但这全凭自愿，绝不勉强。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记忆》的发送上——没有明确要求我们发送《记忆》的，我们绝不相烦。

如果您的亲友想看《记忆》，您又愿意转发，我们乐观其成。如您愿意将其中

的文章推荐给纸媒（杂志报刊），我们亦表欢迎。但是，纸媒在使用《记忆》发表的文章之前，应征求《记忆》编辑部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章得到了作者的授权，并已在或将在正规的出版社结集出版（第一辑现已付梓）。在其它纸媒上发表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另外，纸媒也应该知达作者，征得人家的同意。

《记忆》编辑部

2010-8-26